

當事人視角下的陶德曼調停

張哲維*

本文從陶德曼當事人的視角，重新論述中日戰爭初期由德國擔任中介者傳達日本和談條件給中國的外交活動。德國發動陶德曼調停的內在動機可從希特勒的主觀意願、各方勢力的不同考量和陶德曼的道德使命感三方面探討。事實上，陶德曼曾先後三次親自轉交日本和平條件給蔣中正，分別發生在 1937 年 11 月 5 日和 12 月 2 日，以及 12 月 26 日因蔣生病臨時由孔祥熙轉呈。第一次調停發生在日本陷入淞滬戰場的泥淖之中與迫於布魯塞爾會議的國際壓力，主動提出和緩的和平條件——即沒有要求中國承認滿洲國，但因蔣堅持「國際化政略」而拒絕。第二次調停是在上海淪陷後，日本內部對於是否進攻南京出現分歧時，因外相廣田弘毅向德國傳達原有的和平條件不變而發生。這讓納粹卐字旗一度象徵著和平，飄揚在長江江面上。然而，由於日本主戰派抬頭、德國暫緩承認滿洲國和陶德曼駐地轉移而錯失時機，最終導致和平破滅。第三次調停則已然成為了日本的逼降行動，讓德國面臨騎虎難下的尷尬局面。從當事人陶德曼的視角出發，清楚地顯示出陶德曼調停是在德國建議下，由日本主動提出而促成的，也因日本陷於「勝者迷思」而失敗。德國政府始終扮演中立調停者的角色，並沒有偏頗某一方。反倒是陶德曼本人展現出親華反日的立場，而這是過去以國家為主體論述的陶德曼調停沒有呈現出來的一面。

關鍵詞：陶德曼調停、德國對華政策、中日戰爭、蔣中正的議和底線、滿洲國問題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在中國近代外交史的論述中，外國外交官常被簡化為外國利益的代言人，而忽略其個人的主體性。因此，本文旨在通過突顯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Oskar Paul Trautmann, 1877-1950)在陶德曼調停中的當事人視角，還原此事件的完整脈絡。文中將以陶德曼的個人日記為主要依據，深入解析中、日、德三方在陶德曼調停期間的互動過程，並探討該調停最終失敗的主因。¹通過分析陶德曼的個人觀點，本文強調他與納粹政府在遠東外交方針上的差異。同時，本文還將比較陶德曼在私人日記中流露的情緒與其在外交檔案中執行的具體政策之間的落差，凸顯他在此事件中的個人立場與情感，描繪出不同於國家視角的陶德曼調停。²

¹ 1939年3月27日，汪兆銘(1883-1944)為了合理化對日妥協的態度，發表了標題為〈舉一個例〉的文章。該文提及蔣中正(1887-1975)曾在外交部次長徐謨(1893-1956)的陪同下接見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時表示，國民政府第五十四次國防最高會議接受日本提出的和平條件。汪宣稱自己的和平主張與當時的條件相同。見朱子家，《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臺北縣：古楓出版社，1974)，頁7-13、24。後人論及此事時，大多引用汪兆銘此篇文章，並以陶德曼調停稱呼之，這讓陶德曼成為德國在東亞最著名的外交官。為了反駁國民黨(汪)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任中華通訊社社長林柏生在英文文章“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ang Kai-Shek Peace Failure”中引用〈舉一個例〉，強調調停失敗的主因在於蔣中正的猶豫和親共立場的說詞，時任德國駐上海代理總領事，即陶德曼於1937年底調停時的秘書勞滕施拉格(Heinz Lautenschlager, 1897-1944)，於同年10月3日在一篇給德國外交部的記錄中詳細描述陶德曼調停的來龍去脈。請參照：〈檔案附件——騰打林柏生的英文文章 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ang Kai-Shek Peace Failure〉(1939年10月3日)，PA AA NL Trautmann 1。

² 關於陶德曼遺留文書之引用問題，因檔案均未經編輯，為求統一格式和方便中文讀者閱讀，則採用註1之格式。檔案標題均為筆者依照內容自訂之，原則上內容為主，並附上日期與地點。相對應之館藏地和卷號，請參

陶德曼在學界中鮮少被提及，除了本人博士論文《德國外交官奧斯卡·陶德曼在東亞》外，沒有其他以其為主題的研究。³反之，卻有不少著作提及陶德曼調停。⁴其中西文著作主要利用德國外交部政治檔案，有約翰·P·福克斯(John P. Fox)《德國與遠東危機 1931 到 1938》和 Yu-Hsi Nieh《中日華北衝突的發展與德國調停工作》。此二著作缺乏中、日文方面的史料，主要探討德國政府對調停工作的立場。⁵日文方面有戶部良一《ピース・フィーラー支那事変和平工作の群像》和劉傑《日中戰爭下外交》，均以日本史料為主，主要探討日本內部派系競合關係。⁶中文著作甚多，除了蔣永敬〈抗戰初期的外交與國聯及德使之調停〉和張水木〈德國對中國抗日戰爭之調停〉的專論外，⁷還

照徵引書目。此外，文中「外交部」如未特別說明均意旨「德國外交部」，在註解中縮寫為「AA」。

³ Che-Wei Chang (張哲維), "Oskar Trautmann, ein deutscher Diplomat in Ostasien: Individuum, Nation und Diplomatie aus der Perspektive der Globalgeschichte 1877-1950," (Ph.D. dissertation,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Bonn, 2021), <https://nbn-resolving.org/urn:nbn:de:hbz:5-63813>, accessed March 31, 2025.

⁴ 包括：Karl Drechsler, *Deutschland-China-Japan 1933-1939. Das Dilemma der deutschen Fernostpolitik* (Berlin: De Gruyter, 1964), 41-48; William C. 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234-239.

⁵ John Fox, *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1-193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Yu-Hsi Nieh, *Die Entwicklung des chinesisch-japanischen Konfliktes in Nordchina und die deutschen Vermittlungsbemühungen* (Hamburg: Institut für Asienkunde, 1970).

⁶ 戶部良一，《ピース・フィーラー支那事変和平工作の群像》(東京：論創社，1991 年)。劉傑，《日中戰爭下外交》(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

⁷ 蔣永敬，〈抗戰初期的外交與國聯及德使之調停〉，《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5(臺北，1973)，頁 163-175。張水木，〈德國對中國抗日戰爭之調停〉，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抗戰建國史研討會論文集

有周惠民《德國對華政策》和陳仁霞《中德日三國關係 1936-1938》專書中的一章探討之。⁸上述著作在調停細節上仍不夠清晰，彼此亦有矛盾之處，其論述重點也以國家視角出發。其餘中文著作大多有如王建朗所說的重大問題，即在反法西斯主義意識型態下，對陶德曼調停的論述產生了時空錯置的「日德帝國主義勾結論」和前後矛盾的「國民政府投降論」，⁹如今這樣的論述依然陳出不窮。¹⁰

此外中文著作均存在三大盲點。第一、在德文史料上僅使用《德國外交政策檔案彙編 1918-1945》，而非原檔。¹¹這使得外交檔案喪失了前後脈絡關係，同時也缺乏日文史料加以佐證；第二、在描述 1937 年的德國時，多先入為主的以德國親日論述之。對於陶德曼調停的解釋，也過於強調法西斯主義對於德日關係的親善作用。事實上在里賓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 1893-1946)就任外交部長前，德國內部的親中派，無論是來自外交部或國防軍，依然對遠東政策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第三、過去研究主要凸顯的是中、日、德三國的外交關係，而忽略了三國內部各方勢力對於戰與和之間不同看法的角力過程，以及

(1937-1945)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頁 257-293。

⁸ 周惠民，《德國對華政策》(臺北：三民書局，1995)，頁 163-189。陳仁霞，《中德日三國關係 1936-1938》(北京：三聯書店，2003)，頁 206-262。

⁹ 「日德帝國主義勾結論」的觀點源自於施子愉，〈抗戰初期德日法西斯誘降的陰謀〉，《近代史資料》，1957：3(北京，1957)，頁 106-109。「國民政府投降論」則可見王建朗，〈陶德曼調停中一些問題的再探討〉，《中共黨史研究》，1989：4(北京，1989)，頁 289。

¹⁰ 此盲點普遍存在於中國大陸的研究之中，如：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史》(臺北：三民書局，1998)。

¹¹ 《德國外交政策檔案彙編 1918-1945》(*Akten zur deutschen auswärtigen Politik 1918-1945*)，總共有 75 冊，以下於註解中均簡寫為 ADAP。本文引用之冊數，請參照徵引書目。此彙編為戰後西方盟軍利用查扣的德國外交部檔案選編而成。

調停與戰場變化和布魯塞爾會議(Brussels Conference)之間的互動關係。最後，至今為止所有關於陶德曼調停的研究均缺乏使用三國檔案相互比對，更遑論使用陶德曼的個人史料，以至於在史實不夠清晰的情況下，過度詮釋個別人物和國家的決策。

本文將使用分散於三地的《陶德曼遺留文書》，分別藏於外交部政治檔案館、¹²聯邦檔案館柏林—利希特費爾德分館，以及陶德曼孫女家，¹³其中包含了大量未經整理編目的外交檔案、書信、日記、照片和陶德曼晚年書寫的未出版回憶錄。¹⁴由於所藏史料龐大，本文將時間限縮於陶德曼調停期間。另外將重新梳理前人使用過的德、中、日三國外交檔案。透過多方史料，特別是前人沒有使用過的德文檔案和陶德曼個人史料，一方面嚴謹考證陶德曼調停的史實。另一方面透

¹² 館藏於德國外交部政治檔案館(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es)中的陶德曼個人遺留文書，分為九個檔案匣。該史料由陶德曼長子費爾茲·陶德曼(Fritz Trautmann)於陶德曼過世後轉交給外交官約阿希姆·庫恩(Joachim Kühn)，其中有大量的日記原稿。約阿希姆·庫恩認為基於當時的政治環境該日記不應出版，因此他於1952年6月6日將檔案匣轉交給位於波昂的外交部政治檔案局保存，直到兩德統一後，才隨著外交部搬回柏林。

¹³ 聯邦檔案館保存的史料為陶德曼遺留在德國駐華大使館中的文書資料。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重新建交後，歸還給德意志民主共和國。1990年兩德統一後移交到德國聯邦檔案館柏林—利希特費爾德分館(Bundesarchiv Dienststelle Berlin-Lichterfelde)中收藏。至於後者，筆者透過陶德曼家鄉施利霍(Schlichow)居民協會(Schlichower Bürgerverein e.V.)聯絡到居住在柏林的陶德曼孫女科琳娜·陶德曼(Korinna Trautmann)，於2020年8月前往拜訪時取得該史料。

¹⁴ 陶德曼未出版回憶錄保存在德國外交部政治檔案館陶德曼個人遺留文書第7T檔案匣中(PA AA NL Trautmann 7T)。該回憶錄於1934年5月2日在北平近郊的跑馬場開始動筆，大約於1943年聖誕節前後在家鄉斯利休(Schlichow)完成。請參照：〈陶德曼回憶錄——前言〉(日期不詳)，PA AA NL Trautmann 7T，頁1；〈陶德曼回憶錄草稿——回顧過往〉(日期不詳)，PA AA NL Trautmann 7T。

過強調陶德曼對中日衝突和調停工作的個人觀點，凸顯外交官並非僅是派出國在駐在國的利益代表人，同時也扮演著緩衝兩國關係的角色。

本文將考察以下核心問題，第一、調停是如何發生的？第二、調停為什麼會失敗？第三、當事人對調停的看法是什麼？因此分為四個段落，分別為德國調停的內在動機、三次發生於 1937 年 11 月 5 日、12 月 2 日和 12 月 26 日的調停。結語將從陶德曼的視角出發，回答這三個問題，並藉此分析陶德曼調停的歷史意義。

二、德國調停的內在動機

對德國來說，中日衝突擴大化讓它在遠東陷於左右為難的困窘之中，一面是極富經濟利益的中國市場，另一面是有著「反共抗蘇」相同戰略目標的日本。中日戰爭不僅削弱日本的軍事力量，同時也讓德國擔憂合步樓計畫和對華商貿的停擺，因此維持遠東和平直接關係到德國的核心利益。本節將從德國調停的內在動機探討之，分別為：總理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的主觀意願、各方勢力的不同考量，以及陶德曼的道德使命感。

(一)總理希特勒的主觀意願

陶德曼身為駐華大使，執行調停工作最重要的動機莫過於總理的主觀意願。從 1937 年 6 月 13 日希特勒接見孔祥熙(1880-1967)時的對話中可以看出，他期盼東亞局勢緩和的目的在於「反共」，甚至天真的認為「反共」可以成為中日友好的契機。因此他預言式地建議：「基於反共的共同利益，中日之間的衝突將來一定可以相互調和，為此德

國願意作為調停國。」¹⁵

納粹黨「反共抗蘇」的地緣戰略思想可以回溯到中世紀條頓武士團東進(Drang nach Osten)的歷史脈絡中。¹⁶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在大日耳曼主義(Pangermanismus)下將德波問題政治工具化，一方面形塑了近代德意志民族國家，卻也造成了國族主義的激進化。¹⁷十月革命以後，由於恐懼共產革命蔓延到德國，國內反共聲浪越來越強，這使得原本複雜的民族問題又夾雜著防止共產主義滲透的因素。為了避免在軍事上陷入兩面作戰的窘境，希特勒的戰略構想延續著一戰時的施里芬計劃(Schlieffen Plan)。日本作為唯一有能力箝制蘇聯遠東軍團的國家，與之交好成為了希特勒遠東政策的主軸。這使得納粹德國的遠東政策逐漸從以經濟利益掛帥的考量轉向為對蘇地緣戰略的佈局。

如上所述，早在盧溝橋事變之前，為同時維持在華利益和與日本共同抗蘇，希特勒早已有「調停」中日衝突的主觀意願。他延續著簽訂反共協定時的意識型態迷思，認為中日矛盾可以在「反共」大旗的號召下化解。儘管陶德曼一再示警，他依然以此作為遠東政策的最主要方針，忽略了中日衝突中的國族因素。

雖然陶德曼和其他長期駐華的外交官一再警告，希特勒依然陷於「反共抗蘇」的思考盲點中，導致嚴重的誤判。這可以從希特勒接見孔祥熙時的對話中看出端倪。會談中希特勒強調：「遠東對德國來說不管在政治上或是在領土上都沒有任何目標。」¹⁸他向孔建議，中國

¹⁵ ADAP Serie C. Band VI-2. Nr. 429 S. 917-918.

¹⁶ 請參照: Rolf-Dieter Müller, *Der Feind steht im Osten: Hitlers geheime Pläne für einen Krieg gegen die Sowjetunion im Jahr 1939* (Berlin: Ch. Links Verlag, 2011), 17, 41, 125, 128, 257, 261.

¹⁷ 杜子信,〈近代德波敵對下德意志騎士團國家史的政治工具化〉,《成大歷史學報》,56(臺南,2019),頁133-199。

¹⁸ ADAP Serie C. Band VI-2. Nr. 429 S. 917.

政府應該改組成一個強大的獨裁政府，這將有助於反共事業。「蔣中正是一個上天賜予中國最好的反共人選」。他又提到，德國在遠東採取的任何政治措施都只是基於對抗共產主義的立場。¹⁹他建議：「基於反共的共同利益，中、日之間的衝突將來一定可以相互調和，為此德國願意作為中日之間的『調停國』。」對此孔祥熙回覆：「當適當的時間點來臨時，不會排除德國『調停』中日衝突的可能性。」²⁰

(二) 各方勢力的不同考量

希特勒對遠東問題的決策還必須衡量到德國內部各方勢力的觀點才能有效執行。盧溝橋事變發生後，外交部與各駐外使領館間針對遠東衝突的公文往來非常頻繁，從中可以看出德國政府密切掌握東亞局勢發展。²¹陶德曼在給友人的信件中寫到，他相信中日雙方會避免真正的衝突。²²駐日大使狄克森(Herbert von Dirksen, 1882-1955)也向外交部回報，日本希望將衝突侷限在華北。他和駐日武官歐特(Eugen Ott, 1889-1977)主動向日本表達德國希望華北局勢能夠和緩。²³外交部長紐賴特

¹⁹ ADAP Serie C. Band VI-2. Nr. 429 S. 917.

²⁰ ADAP Serie C. Band VI-2. Nr. 429 S. 918.

²¹ 其中中日戰爭專檔總共有 28 個檔案匣，其檔案號為：PA AA RZ 211/104823-104850。本文引用德文檔案的註解方式，以德國外交部政治檔案館規定為主。如檔案中已有標註頁碼，則在檔案號後加上頁碼，並以以下順序簡略標示出：檔案書寫者、書寫地、收件者和時間。詳情請參閱：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s, “invenio - recherchieren, bestellen und zitieren,” <https://archiv.diplo.de/arc-de/im-archiv-forschen/bestellen-und-zitieren-mit-invenio>, accessed March 31, 2025.

²² 〈陶德曼給理查德·烏爾里希(Richard Ulrich)博士的私人信件〉(1937 年 7 月 8 日)，BArch N 2311/41，頁 38。

²³ ADAP Serie C. Band VI-2. Nr. 459 S. 961-962.

(Konstantin von Neurath, 1873-1956)更向英、美表示，只要英、美能為中日糾紛協商出和平辦法，德國一定會支持。²⁴國務秘書馬肯森(Hans Georg von Mackensen, 1883-1947)在給陶德曼的訓令中表達出德國對中日衝突的基本立場——中立和維持經濟利益。²⁵

雖然蔣中正到了 1937 年 7 月 27 日才在日記中寫道：「倭寇既正攻北平，則大戰再不能免。」²⁶但早於 21 日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團團長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1878-1966)就已經向陶德曼提及：「蔣元帥致力於以和平的方式來調解衝突，但是絕對不會在中國利益受損的條件下向日本妥協。」他悲觀地認為這場衝突將會擴大成全面戰爭。²⁷外交部深知，德國在東亞必須顧慮到日本的意願，因此在日本堅決反對其他國家介入的情況下，它也必然反對主動調停中日衝突。²⁸政治局局長魏茨澤克(Ernst Freiherr von Weizsäcker, 1882-1951)堅守中立政策，他於 24 日向英國駐德參贊表示：「雖然德國希望遠東局勢和緩，但沒有打算主動介入。」²⁹

隨著局勢惡化，德國內部開始對「中立政策」有了不同的解讀。1937 年 8 月 16 日希特勒在演講中強調德日合作是確定的，但對於中日衝突德國必須保持中立，以便能履行和中國的合約，換取德國所需的原物料。³⁰對此「親日派」——以希特勒安插在外交系統的親信、

²⁴ ADAP Serie C. Band VI-2. Nr. 465 S. 968-969.

²⁵ ADAP Serie C. Band VI-2. Nr. 480 S. 996.

²⁶ 《蔣中正日記》，1937 年 7 月 27 日，國史館藏，典藏號：002-150101-00023-287。

²⁷ PA AA RZ 102/29826: Telegramm Trautmann in Nanking an AA am 21. Juli 1937.

²⁸ ADAP Serie D. Band I. Nr. 466 S. 602.

²⁹ PA AA RZ 102/29826: Aufzeichnung von Weizsäcker am 24. Juli 1937.

³⁰ PA AA RZ 102/29560, S. 82: Aufzeichnung von Neurath in Leinfelden am 17. August 1937.

時任駐英大使里賓特洛甫為首的納粹黨員和駐日大使狄克森——相信日本對華北的軍事行動是為了反共。³¹日方已提供德國不少關於中蘇合作的情報，坐實了「親日派」對中國政府親共的看法。³²戰爭爆發後，日本曾多次要求德國召回駐華軍事顧問團和禁止軍火輸中。對此「親日派」基於對日情誼，主張接受日本的要求。³³他們與以參謀本部第一部長石原莞爾(1889-1949)和參謀次長多田駿(1882-1948)為首的日本「不擴大派」相同，反對日本將軍事力量消耗在中國戰場上，這將不利於德國「反共抗蘇」的戰略布局。³⁴兩者經過多次的接觸後，達成了促成調停的共識。

另一派則是以國防部軍備局的凱特爾(Wilhelm Keitel, 1882-1946)和湯瑪士(Georg Thomas, 1890-1945)為首的軍方，他們秉持的「中立政策」是考量到國防軍對蘇作戰的軍備需求，主張維持德中友好關係。這是國防軍從中國取得稀有礦產——如鎢礦，³⁵用以重整軍備的必要條件。他們多次阻止日方因軍火輸中和軍事顧問團問題的施壓，讓德中軍事合作

³¹ PA AA RZ 102/29560, S. 12-14: Telegramm von Weizsäcker in Berlin an Botschaft in Tokio am 28. Juli 1937.

³² PA AA RZ 102/29560, S. 91: Telegramm Herbert von Dirksen in Tokio an AA am 19. August 1937.

³³ 德國駐日大使給外交部的電報中，不斷地提到日本方面要求德國召回駐華軍事顧問團和禁止武器輸中，例如：PA AA RZ 105/29875 S. 296 Telegramm von Dirksen in Tokio an AA am 27. Juli 1937; PA AA RZ 105/29875, S. 104-105: Telegramm von Dirksen in Tokio an AA am 25. August 1937; PA AA RZ 105/29875, S. 9-10: Telegramm von Dirksen in Tokio an AA am 24. September 1937.

³⁴ 劉傑，《日中戰爭下外交》，頁101-154。在此書中，不擴大派又被稱之為外交交涉派。除了參謀本部戰爭指導班的成員外，還有部分外務省的官員，其中以東亞局局長石射猪太郎為首。

³⁵ 請參照：陳哲宇，〈抗戰前中德鎢礦貿易及其影響之探討(1929-1937)〉，《中興史學》，12(臺中，2006)。

得以持續進行。³⁶

以紐賴特為首的職業外交官，如陶德曼與魏茨澤克，認定的「中立政策」是以維持現狀為前提。他們不贊成反共協定，認為這反而讓中國人誤以為德國是親日的。³⁷他們更不相信日本對華軍事行動是為了反共，同時主張對華政策是建立在履行既有條約、尊重國際秩序和「與英美協同」的基礎上。³⁸如果禁止軍火輸中和召回軍事顧問團，將會使蘇俄取代德國在華的地位，讓中國徹底親共。他們一再地強調，中日戰爭反而促使共產主義遍行中國，這與反共協定的立意剛好相反。³⁹

如同外交部的擔憂，中日衝突的擴大迫使中蘇合作，埋下了德中關係惡化的因子，⁴⁰為此德國密切關注中蘇合作的消息。駐莫斯科大使於 1937 年 8 月 23 日告知外交部，莫斯科外交官圈內流傳著蘇聯準備援助中國大量飛機和飛行員的消息。⁴¹國防參政會秘書長張群(1889-1990)也於 27 日告訴陶德曼，由於日本侵略迫使中國必須和蘇俄恢復外交關係，但中國依然會堅持反共的立場。⁴²同日外交部長王寵惠(1881-

³⁶ PA AA RZ 102/29560, S. 94: Aufzeichnung von Mackensen in Berlin am 10. August 1937.

³⁷ PA AA RZ 102/29826: Telegramm Trautmanns in Nanking an AA am 2. August 1937.

³⁸ PA AA RZ 102/29560, S. 11: Telegramm Herbert von Dirksen in Tokio an AA am 27. Juli 1937.

³⁹ PA AA RZ 102/29560, S. 20: Telegramm von Weizsäcker in Berlin an Botschaft in Tokio am 28. Juli 1937.

⁴⁰ PA AA RZ 105/29875, S. 146: Telegramm von Dirksen in Tokio an AA am 19. August 1937. 在此電報中狄克森向外交部回報，日本外交官東鄉茂德(1882-1950)告訴他，蘇聯和南京國民政府於 8 月 15 日簽署秘密協定，由蘇聯提供武器給中國。

⁴¹ PA AA RZ 102/29560, S. 122: Telegramm von der Schulenburg in Moskau an AA am 23. August 1937.

⁴² PA AA RZ 105/29875, S. 91: Telegramm Trautmanns in Nanking an AA in

1958)通知陶德曼，中蘇將於8月28日簽訂互不侵犯條約。⁴³這些消息都讓陶德曼非常憂心，他於9月9日向外交部報告，經委會委員陳立夫(1900-2001)告知他中共紅軍將被編入中國正規軍中。⁴⁴隔日又報告，中國派遣12名飛行員到烏魯木齊拿取蘇聯援助的12架飛機。⁴⁵張群於25日向他澄清，希望德國能理解中國是為了生存才不得已和蘇聯合作。9月27日魏茨澤克在與中國駐德大使程天放(1899-1967)會面時也表達了對中蘇合作的擔憂。中蘇關係的改善讓陶德曼越來越難以說服希特勒維持「中立政策」，⁴⁶更讓德國產生對中國親蘇的危機感。⁴⁷為了緩衝德中之間可能的矛盾，以陶德曼為首的外交官力促「調停」中日衝突。

當主戰場從華北轉移到上海，從區域衝突變成大規模決戰時，德國內部對於既定的遠東政策分歧越來越大。「調停」成為了納粹黨、國防軍和外交部之間維持共識的唯一辦法。因此在與日本「不擴大派」取得連絡後，陶德曼以德國政府之名向日本政府建議，開啟了陶德曼調停。

(三) 陶德曼的道德使命感

不同於納粹高層顧慮日本的態度和外交部的消極立場，陶德曼對促成「調停」表現得非常積極，這除了是維護德國在華利益外，也是

Berlin am 27. August 1937.

43 〈陶德曼日記——1937年8月27日於南京〉，PA AA NL Trautmann 6T。

44 PA AA RZ 102/29560, S. 213: Telegramm Trautmanns in Nanking an AA in Berlin am 9. September 1937.

45 PA AA RZ 102/29560, S. 216: Telegramm Trautmanns in Nanking an AA in Berlin am 10. September 1937.

46 〈陶德曼給外交部的報告——1937年8月27日於南京〉，BArch N 2311/24，頁121。

47 PA AA RZ 105/29875, S. 3: Telegramm Trautmanns in Nanking an AA in Berlin am 25. September 1937.

基於他的個人經驗、基督信仰和對中國的情誼。

陶德曼曾親身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德國最高陸軍指揮部(Oberste Heeresleitung)架空內閣的時代，這讓出身於職業外交官的陶德曼對於軍方侵奪外交權的行為非常反感。擔任駐東京參贊期間，他曾親眼目睹日本極右派軍官在關東大地震後，殘忍殺害社會民主派人士的未成年親屬，之後又發生多起政府高層遭軍人暗殺的事件，這都讓他對日本的觀感極為不佳，特別是日本軍方。⁴⁸在擔任駐華公 / 大使期間，更歷經了日本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屢次破壞國際秩序，對中國步步進逼的過程。他在日記、回憶錄和數篇文章中，明確表達出對日本反感的情緒，甚至嚴厲批判日本的尚武文化。⁴⁹這使他對東亞局勢的判斷明顯偏向國民政府。他深知中國的軍事力量不足以對抗日本，因此對蔣中正的政略頗為讚許。他認為中國應以拖待變，等待國際局勢和日本政局的變化，才能迫使日本與中國和談。

陶德曼不同於過往謹慎保守的態度，為了讓中國恢復和平，他採取如同納粹黨人般的積極行動，甚至願意以個人身分為國府奔走。他於 1937 年 7 月 26 日主動向王寵惠表示：「不管是駐日還是駐華的德國外交官都將致力於恢復東亞和平的工作。」⁵⁰他在沒有政府的授意下，親自向蔣中正暗示德國可以調停中日衝突。蔣清楚意識到德國是唯一能與日本溝通的國家，但也知道德國真正的擔憂在於中蘇交好，所以他向陶德曼說：「如果局勢惡化，中國將被迫與蘇聯達成友好協

48 〈給外交部關於中國內部局勢的報告——1938 年 1 月 23 日於漢口〉，PA AA NL Trautmann 6T。

49 陶德曼對日本負面看法的史料繁多，在此列出一篇文章為例：〈未出版文章草稿——遠東局勢〉，PA AA NL Trautmann 7T。

50 PA AA RZ 105/29875, S. 297: Telegramm Trautmanns in Nanking an AA am 27. Juli 1937.

議。」⁵¹從中可以看出，陶德曼個人積極力促中日和解的政治考量，在於避免中蘇交好破壞中德關係，因此他發揮緩衝者的角色，避免任何會破壞德國對華關係的因素。

當華北局勢快速惡化時，陶德曼更毫無掩飾地展現了他對日本反感的情緒。在日軍渡過永定河後兩日，他於報告中寫道：「日本宣稱對華發動戰爭是為了執行德日反共協定，這種鬼話沒有人會相信。」⁵²他也在日記中批評日本文化是建立在種族優越幻想之中的愛國主義。這樣的種族情結在滿洲實驗成功後越來越膨脹，如今日本已經是軍國主義的化身。⁵³由於陶德曼過於從中國立場看待中日衝突，影響了他對時局的判斷，卻也促成了陶德曼調停。

1937年8月初當他對於上海局勢惡化感到失望之際，汪兆銘突然詢問他，是否可以透過德國打聽日本的和平條件。對此陶德曼悲觀地表示，一開始日本只是想要解決華北問題，如今目標已經變成徹底改變中日關係，因此日本不會忍受第三國干預此事。⁵⁴然而當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時，他又於當天下午向蔣中正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來看，人們不應該等到精疲力盡時才想到和平。」他以自己的親身經驗向蔣勸告，中國應盡早與日本和談。蔣回覆，只要日本不恢復戰前狀態，他不可能接受日本的條件。⁵⁵次日國民政府發表《自衛抗日聲明書》。當天陶德曼在拜訪王寵惠時主動表示，他願意以個人身分幫忙中國政府，他說：「我非常理解中國的困難，德國的利益在

51 PA AA RZ 105/29875, S. 293-294: Telegramm Trautmanns in Nanking an AA am 27. Juli 1937.

52 PA AA RZ 105/29875, S. 263: Telegramm Trautmanns in Nanking an AA am 1. August 1937.

53 〈陶德曼日記——1937年8月2日於南京〉，PA AA NL Trautmann 6T。

54 PA AA RZ 102/29560, S. 52: Telegramm Trautmanns an AA am 10. August 1937.

55 〈陶德曼日記——1937年8月13日於南京〉，PA AA NL Trautmann 6T。

於盡可能的維持東亞和平。」⁵⁶

當中國軍隊在上海戰場有效抵禦日本的進攻時，他開心地在日記中寫到，如此一來調停就有可能發生。⁵⁷當日本要求德國禁止向中國運送軍火時，他又於內部報告中嚴詞反駁日本的要求。他寫到，德國向中國運送武器無涉德日友誼，因為中日之間沒有正式宣戰。即使中日處於戰爭狀態，運送武器給交戰國也不違反國際法。⁵⁸此時國際宣傳戰正如火如荼地展開，德國內部的親中派與親日派之間也正針對控制輿論的取向而相互攻擊。陶德曼在 1937 年 8 月 26 日的日記中嚴厲地批判宣傳部長戈培爾(Joseph Goebbels, 1897-1945)是控制德國輿論親日的幕後黑手。他寫道：「為了迎合日本反共戰爭的命題，刻意扭曲中國人正在為生存而戰的事實。」⁵⁹

正當陶德曼於 1937 年 9 月 19 日夜晚與徐悲鴻(1895-1953)和傅斯年(1896-1950)探討中國藝術時，他收到日軍即將於 9 月 21 日轟炸南京的消息。⁶⁰基於個人的情誼，他堅決反對撤離南京，成為唯一一位當日軍轟炸南京時還留在城中的外國大使。⁶¹這引起日本政府要求德國召回陶德曼。⁶²對此陶德曼有失身分地公開批判日本是侵略者。⁶³

56 〈陶德曼給外交部的報告——1937 年 8 月 14 日於南京〉，BArch N 2311/25，頁 55。

57 〈陶德曼日記——1937 年 8 月 20 日於南京〉，PA AA NL Trautmann 6T。

58 PA AA RZ 105/29875, S. 22: Telegramm Trautmanns in Nanking an AA am 23. September 1937.

59 〈陶德曼日記——1937 年 8 月 26 日於南京〉，PA AA NL Trautmann 6T。

60 〈陶德曼日記——1937 年 9 月 19 日於南京〉，PA AA NL Trautmann 6T。

61 PA AA RZ 102/29560, S. 230: Telegramm Trautmanns in Nanking an AA in Berlin am 20. September 1937.

62 PA AA RZ 105/29875, S. 30-31: Aufzeichnung von Neurath in Berlin am 22. September 1937.

63 PA AA RZ 105/29876, S. 75: Telegramm von Dirksen in Tokio an AA am 8.

因此從德國視角來看，陶德曼調停的動機除了希特勒的主觀意願和內部各方勢力為維持共同利益的共識外，陶德曼本人的道德使命感更驅使他成為調停的執行人。

三、第一次調停——戰爭與和平的雙重奏

陶德曼調停與淞滬會戰的發展，以及布魯塞爾會議的進行息息相關。本節將分析德國接受擔任調停國的背景，並簡述第一次陶德曼調停的來龍去脈。

（一）淞滬會戰與布魯塞爾會議

根據石原莞爾於廣田內閣時期制定的《國防國策大綱》中可以看出，日本的戰略目光在於蘇聯。對華政策之重點，在於使華北迅速成為防共、親日滿的特殊地區。盧溝橋事變發生後，日本低估了國府戰鬥到底的決心，誤以為能以強硬的態度和局部戰爭的勝利迫使國府讓步，使戰爭快速結束。⁶⁴不同於石原的對蘇戰略佈局，主戰派主張發動全面戰爭，一次性解決中國問題。陶德曼調停的成敗關鍵與日本「不擴大派」和「主戰派」的戰略相爭有直接的關係。

在淞滬會戰前外務大臣廣田弘毅(1878-1948)曾向狄克森說到，在取得軍隊中極右派諒解的前提下，日本願意和蔣中正和談。⁶⁵狄克森於1937年8月23日給外交部的電文中表示：「當中國感受到軍事上的

Oktober 1937.

⁶⁴ 鹿錫俊，〈中日戰爭時期日本對蔣政策的演變〉，《近代史研究》，1991：4(北京，1991)，頁214。

⁶⁵ PA AA RZ 102/29560, S. 41-42: Telegramm von Dirksen in Tokio an AA am 3. August 1937.

劣勢和日本認為戰鬥是不必要時，那麼德國就能夠從中調停。」⁶⁶相反的，以法肯豪森為首的軍事顧問對於中國能取得最終勝利深具信心。陶德曼也在此時開始對調停懷抱希望，行政院參議徐道鄰(1906-1973)在拜訪他時問到，希特勒願意調停中日戰爭是否為真。⁶⁷他告訴徐，德國政府有意調停。⁶⁸

多田駿於 1937 年 9 月 13 日表示日本應「在外交方面開展祕密活動」和「防止戰事變成長期戰爭」。⁶⁹參謀本部上奏給天皇的陸軍作戰計畫為「大致應以 10 月上旬為期，在華北及上海兩方面展開攻勢，予以重大打擊，並使之屈服」。該計畫規定：「兩面攻勢未實現使中國屈服時，以其他各種手段挫折敵之持久意志，同時節約直接對華作戰兵力，將所需部隊轉至滿洲，完成對蘇戰備。」⁷⁰從中可以看出，日方並無長期對華作戰的打算，因而急於調停。陶德曼在 14 日的日記中寫到，兩位前日本陸軍大臣宇垣一成(1868-1956)和荒木貞夫(1877-1966)都認為這場戰爭是嚴重的錯誤，這讓他對於調停懷抱希望。⁷¹

此時在上海戰場上，國軍依然堅守羅店鎮，日軍出乎意料地陷入苦戰。日本政府一方面催促德國撤回駐華軍事顧問團，另一方面內部反對戰事擴大的聲浪也越來越大，同時布魯塞爾會議的召開更對日本

⁶⁶ PA AA RZ 102/29560, S. 117-118: Telegramm von Dirksen in Tokio an AA am 23. August 1937.

⁶⁷ 〈陶德曼日記——1937 年 9 月 10 日於南京〉，PA AA NL Trautmann 6T。

⁶⁸ PA AA RZ 102/29560, S. 215: Telegramm Trautmanns in Nanking an AA in Berlin am 10. September 1937.

⁶⁹ 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戰史叢書(86)－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東京：朝雲出版社，1975)，頁 342。

⁷⁰ 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戰史叢書(86)－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頁 301。

⁷¹ 〈陶德曼日記——1937 年 9 月 14 日於南京〉，PA AA NL Trautmann 6T。

極為不利。國聯於 10 月 6 日決議召集九國公約簽署國於布魯塞爾開會討論中國提出的控訴案，並同時邀請德國和蘇俄參與此會。中國試圖拉攏德國參與會議，共同對日本施壓，但遭到拒絕。⁷²

廣田第一次向首相近衛文麿(1891-1945)提出的和平條件中，要求中國承認滿洲國，⁷³但隨著戰事膠著和國際壓力，為了讓中方能與日本談判，該條件有所鬆動。在 1937 年 10 月 1 日四相會議通過的《支那事變處置要綱》中，第一次不排除透過第三國與中國談判。在〈事變處置要綱附屬具體的方案〉中寫到，要達成一個真正能實現兩國之間善意的「new deal」，其中關鍵在於中國必須正式承認滿洲國。但在廣田給駐華大使川越茂(1881-1969)的信件中卻提到，陸軍堅持中國必須正式承認滿洲國，然而為了讓談判得以進行，外務省主張，如不得已時，該條件可私下約定。對此陸軍亦表示反對。⁷⁴

外務省對滿洲國承認問題態度的轉變，與德義兩國對於西班牙內戰(Spanish Civil War)和反共協定的外交態度有關。從外交部與狄克森 8 月到 10 月份的電報中可以看出，德國密集地參與了義大利加入反共協定的外交工作。⁷⁵當 1937 年 10 月 8 日日本閣議決定拒絕參加布魯塞爾會議時，廣田預估在義大利正式加入反共協定後，德國將會連同義大利於 11 月 25 日以日本承認西班牙佛朗哥政權作為交換，承認滿洲國。透過德、義、西三國承認滿洲國，在國際上對中國施加壓力。如此一來，就沒有必要要求中國承認滿洲國，因此廣田決定不必堅持該

72 PA AA RZ 102/29560, S. 260-261: Aufzeichnung von Weizsäcker in Berlin an deutschen Botschaften in Tokio und Nanking am 24. September 1937.

73 矢部貞治編著，御廚貴監修，《近衛文麿》(東京：ゆまに書房，2006)，頁 456-457。

74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日中戦争。第一冊》(東京：外務省，2011)，頁 182-189。

75 PA AA RZ 102/29560.

和平條件。⁷⁶

針對德國是否參與布魯塞爾會議，外交部內有不小的紛歧。紐賴特向程天放解釋，不參與該會的主因是中國於 1926 年反對德國加入九國公約。⁷⁷陶德曼作為當年處理該事件的主要負責人，卻主張德國應參與布魯塞爾會議，因為該會議主要目的在於調停中日戰爭。他建議德國應該接受任何可以調停中日衝突的工作，這不僅能夠維持與日本的友誼，又可以維持在中國的利益。⁷⁸馬肯森於 1937 年 10 月 19 日要求陶德曼向中國政府解釋，德國不參與會議的原因是，在沒有日本參與的情況下，該會議是沒有希望的，同時向中國表達德國作為調停國的意願。⁷⁹希特勒於 10 月 27 日正式拒絕參與該會議，⁸⁰當陶德曼得知此事後，⁸¹於日記中批評本國政府對中國說謊：「德國因為日本反對而不參加布魯塞爾會議，卻向中國人說該會議無助於和平。」⁸²陶德曼為求緩和歐洲局勢，極力希望能透過共同調停中日衝突來拉攏德英關係，然而他「與英美協同」的想法遭到外交部領導層反對。

由於淞滬戰場陷入膠著，使日本政府向德國要求禁止軍火輸中和

76 服部龍二，《廣田弘毅：「悲劇の宰相」の実像》（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8），頁 172；原田熊雄，《「西園寺公と政局」第六卷》（東京：岩波書店，1952），頁 138。

77 ADAP Serie D. Band I. Nr. 496 S. 625.

78 〈陶德曼給外交部的報告——1937 年 10 月 19 日於南京〉，BArch N 2311/23，頁 30。

79 PA AA RZ 105/29976, S. 47-48: Telegramm von Mackensen in Berlin an deutsche Botschaft in Nanking am 22. Oktober 1937.

80 PA AA RZ 105/29976, S. 41: Aufzeichnung von Neurath in Berlin am 27. Oktober 1937.

81 PA AA RZ 102/29826, S. 375: Aufzeichnung von Mackensen in Berlin am 29. Oktober 1937.

82 〈陶德曼日記——1937 年 10 月 29 日於南京〉，PA AA NL Trautmann 6T。

撤回軍事顧問團的措辭更加強硬。⁸³德國為了同時維護在華經濟利益和維持德日共同「反共抗蘇」的地緣戰略考量，其內部開始探討單獨調停的可能性，而日本也開始鬆動。廣田於 1937 年 10 月 21 日向狄克森表示：「如果有一個與中國友善的國家，如德國和義大利，能勸說中國的話，那麼日本將非常願意與中國直接談判。」⁸⁴10 月 22 日日本政府在〈對第三國斡旋之對應方針〉文件中，決定正式接受善意第三國的斡旋。⁸⁵魏茨澤克稱：「當德國在中日雙方都有良好基礎的情況下，那麼德國『調停』中日衝突就有可能。」⁸⁶

（二）上海之旅的意外訪客

根據日文史料可以得知，參謀本部中的不擴大派在戰爭爆發後不久，就開始與歐特接觸，試圖透過德國調停中日衝突。在日本政府正式接受德國調停前，參謀本部特使馬奈木敬信(1894-1979)在不擴大派的委託下，於 10 月 17 日和歐特一同前往上海與陶德曼會面，對此陶德曼事先毫不知情。⁸⁷

與此同時，外交部於 1937 年 10 月 22 日接獲日本願意接受德國調停的電文後，立即轉告陶德曼。由於陶德曼為了迎接因華北事變困

⁸³ PA AA RZ 105/29876, S. 5: Aufzeichnung von Mackensen in Berlin am 8. November 1937; PA AA RZ 105/29876, S. 58-61: Aufzeichnung von Mackensen in Berlin am 19. Oktober 1937.

⁸⁴ PA AA RZ 211/101399, S. 1: Telegramm von Dirksen in Tokio an AA am 21. Oktober 1937.

⁸⁵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日中戰爭。第一冊》，頁 189。

⁸⁶ ADAP Serie D. Band I. Nr. 525 S. 640.

⁸⁷ 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戰史叢書(86)－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頁 455。

於天津的夫人，於該日一早從南京出發前往上海，⁸⁸因此沒有馬上看到這封電文。⁸⁹正當他於 26 日在上海拜訪中國海關總稅務司梅樂和(Frederick Maze, 1871-1959)時，歐特和馬奈木突然出現。⁹⁰馬奈木遞給陶德曼一張由參謀本部第二部部長本間雅晴(1887-1946)所寫的紙條，⁹¹上面記錄著參謀本部與中國和談的條件。⁹²條件中並沒有要求中國承認滿洲國。這顯示出，不擴大派急於結束戰爭。他們希望能在陶德曼的幫助下，保全面子與中國和談。⁹³

(三) 蔣中正的「國際化政略」

正當陶德曼於上海時，外務省政務次官於 1937 年 10 月 28 日向

88 〈陶德曼於南京給外交部電報——1937 年 10 月 19 日〉，PA AA IH Rep. IV. Personalia Nr. 85 Trautmann Band 3。

89 PA AA RZ 211/101399, S. 2: Telegramm von Mackensen in Berlin an deutsche Botschaft in Nanking am 22. Oktober 1937.

90 由於歐特作為反共協定的主要促成者之一，陶德曼對他的觀感不佳。他認為歐特與日本參謀本部之間的合作過於親密，反對歐特作為軍人侵奪了外交官的職權。因此陶德曼雖然知道歐特在上海，但並沒有與之會面的計畫。請參照：〈陶德曼日記——1937 年 10 月 29 日於南京〉，PA AA NL Trautmann 6T。

91 〈陶德曼給外交部的報告——1937 年 11 月 6 日於南京〉，BArch N 2311/23，頁 8。

92 〈陶德曼記錄草稿——1937 年 10 月 29 日於南京〉，PA AA NL Trautmann 1。和談條件為：「1. 日本不要求華北獨立，滿洲國不會在華北重演，只需要事實上承認華北自治，並且給予日本經濟上的特權；2. 中國放棄與俄國的關係，並且與日本共同反共；3. 日本在處理完上海戰事之後，是否進一步對南京採取行動取決於蔣介石的態度；4. 日本軍方並不堅持蔣介石必須離開政府；5. 反日運動必須終止，同時日本將尋求友好的合作關係；6. 日本將會充分考慮不損害南京政府的尊嚴；7. 在上述的基礎上，日本將會停止戰鬥。」

93 〈陶德曼日記——1937 年 10 月 29 日於南京〉，PA AA NL Trautmann 6T。

狄克森直言，如果德國願意對中國施以友好的影響，使之願意與日本直接談判，那麼日本政府將會感謝德國。⁹⁴外務省的考量在於，反對布魯塞爾會議以國際之名而介入中日衝突，以避免蔣中正將中日衝突「國際化」的意圖。⁹⁵與蔣相同的是，陶德曼主張德國應參與布魯塞爾會議，其意圖也是讓德國外交「國際化」。⁹⁶然而納粹黨的外交政策卻是擴大反共協定與日義兩國結盟，建構箝制蘇俄的地緣戰略佈局。在此思維下，里賓特洛甫力促義大利加入反共協定。⁹⁷第一次陶德曼調停就在德國內部這兩種力量均勢的情況下展開。

陶德曼返回南京後立即向國府外交次長陳介(1885-1951)表示，現在是開始和平協商的時刻了。⁹⁸雖然他在日記中對於調停一事感到悲觀，但仍寫道：「這件事情必須現在就去做，否則將不再會有機會。是神在我內心中驅使著我行動，而非我自己本身。」這裡他將基督信仰視為他促成和平的動力，認為如果德國能夠調停東亞衝突，將會改善在國際社會中的名聲，進一步緩解與英美間日益緊張的外交關係，為世界帶來和平福祉。⁹⁹從陶德曼日記中可以清楚看出，其「與英美協同」的調停動機，與納粹政府基於對蘇的地緣戰略佈局有很大的不同。

陶德曼主動拜訪陳介的消息讓外交部感到擔憂，它在給陶德曼的

94 PA AA RZ 211/101399, S. 5: Telegramm von Dirksen in Tokio an AA am 28. Oktober 1937.

95 鹿錫俊，〈日本的國際戰略與中日戰爭的擴大化——論聯接中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一個關鍵因素〉，《近代史研究》，2007：6(北京，2007)，頁43。

96 PA AA RZ 105/29976, S. 34: Telegramm Trautmanns in Nanking an AA am 30. Oktober 1937.

97 PA AA RZ 105/29976, S. 43: Telegramm Trautmanns in Shanghai an AA am 26. Oktober 1937.

98 PA AA RZ 211/101399, S. 7-8: Telegramm Trautmanns in Nanking an AA am 30. Oktober 1937.

99 〈陶德曼日記——1937年10月29日於南京〉，PA AA NL Trautmann 6T。

電報中強調，陶德曼只能在日本的請求下向中國傳遞和談條件，絕不能超過作為「信使」的角色。¹⁰⁰這意味著陶德曼只能夠被動，而非主動地參與調停事務。這樣的訓令並非外交部刻意保留，而是擔憂陶德曼過於心急破壞德國的中立地位。¹⁰¹

廣田於 1937 年 11 月 2 日正式委託德國調停中日戰爭，¹⁰²隔日紐賴特要求陶德曼向蔣中正表達，德國受日本委託調停中日衝突。¹⁰³當陶德曼於 11 月 4 日收到電報時，對於紐賴特突然要求他從被動轉為主動感到驚訝。¹⁰⁴隔日下午蔣中正於孔祥熙的別墅中接見陶德曼。¹⁰⁵他直接向蔣表示他是作為和平的「信使」而來，並遞交日本的和平條件。¹⁰⁶

¹⁰⁰ PA AA RZ 105/29976, S. 21: Telegramm von Mackensen in Berlin an deutsche Botschaft in Nanking am 30. Oktober 1937.

¹⁰¹ PA AA RZ 211/101399, S. 10: Telegramm Trautmanns in Nanking an AA am 31. Oktober 1937.

¹⁰² PA AA RZ 211/101399, S. 15: Telegramm von Neurath in Berlin an deutsche Botschaft in Nanking am 3. November 1937.

¹⁰³ PA AA RZ 211/101399, S. 13-14: Telegramm von Dirksen in Tokio an AA am 3. November 1937.

¹⁰⁴ 〈陶德曼日記——1937 年 11 月 5 日於南京〉，PA AA NL Trautmann 1。

¹⁰⁵ 「陶德曼轉告之日本和談條件英文版」(1937 年 11 月 5 日)，〈德國調停中日戰爭〉，《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20-990700-0009-004。

¹⁰⁶ 〈陶德曼日記——1937 年 11 月 4 日於南京〉，PA AA NL Trautmann 6T。和平條件為：「1.內蒙設立自治政府與外蒙國際地位相等，此種辦法既有先例，中國似不能反對；2.華北沿滿洲國邊界至平津以南一帶設立非武裝區，區內治安由中國警官指揮之、中國警察隊維持之；3.上海設立非武裝區較現有者為大，由國際警察管理之，餘無變更；4.停止排日政策，此僅指 1935 年在南京商議時日本提出之要求(如修訂學校課本等項)，應予照辦；5.共同反共。依據中國駐東京大使給予之消息，中蘇不侵犯條約果無秘密條款則共同防共並不與之抵觸；6.降低日貨關稅稅率；7.外國人權利當予尊重。」本譯文根據國史館館藏檔案：「陶德曼轉告之日本和談條件」

該條件和本間雅晴紙條中的條件略有差距，但依然沒有要求承認滿洲國。這意味著，無論是透過軍部或正式外交渠道，日方均是根據1937年10月8日閣議時廣田對國際局勢的判斷，傳達沒有要求中國承認滿洲國的和平條件，以此向中方讓步，期盼盡早結束雙方衝突。

陶德曼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德國為例，力勸蔣接受日本的條件。¹⁰⁷蔣向他表示，如果他接受了，那麼國民政府一定會遭受輿論的嚴厲批判，甚至中國會爆發革命。蔣承認如果日本將戰爭持續下去，中國將難有獲勝的機會，但是中國人絕對不會屈服於武力之下。陶德曼問道：「這不就等於是給共產黨在東亞很好的發展機會嗎？」蔣回答道：「如果因為日本的軍事行動使得中國政府無法長久維持下去的話，那麼將必然導致紅軍統治中國。」陶德曼向蔣表示他最近重讀俄國革命史，因此他擔憂地說道：「當共產主義統治中國時，將為這個國家帶來可怕的未來。」最後蔣考量到布魯塞爾會議正在進行，因此請求他為這次的調停工作保密。¹⁰⁸因為蔣不希望調停的消息讓他國誤以為中日雙方已在尋求和解，這將會讓日本免於國際輿論的譴責，同時也讓可能通過的經濟制裁破滅。¹⁰⁹由此可見，蔣此時將希望放在布魯塞爾會議的國際制裁上，堅持「國際化政略」。

陶德曼夫人海德薇(Hedwig Schulz, 1881-1946)於家書中紀錄了1937年

(1937年11月5日)，〈德國調停中日戰爭〉，《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990700-0009-005 和 020-990700-0009-006。

¹⁰⁷ 〈陶德曼給外交部的報告——1937年11月6日於南京〉，BArch N 2311/23，頁15。

¹⁰⁸ 以上蔣、陶間的對話，皆見於〈陶德曼日記——1937年11月5日於南京〉，PA AA NL Trautmann 1。

¹⁰⁹ 矢部貞治編著、御廚貴監修，《近衛文麿》（東京：ゆまに書房，2006），頁458。

10月25日到28日上海在硝煙烽火之中的情況。¹¹⁰10月27日清晨約五點十五分，從蘇州河面上傳來的劇烈爆炸聲將海德薇從下榻的國際飯店(Park Hotel)七樓床榻上驚醒。她寫道：「那時我還沒有意識到，在旅館背後正上演著一場可怕的戰爭。」她和陶德曼爬上十四樓，往蘇州河的方向一看，距離飯店只有約五百公尺的新橋已經被炸毀，閘北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北車站上豎立著日本的太陽旗。陶德曼氣憤地說道：「與這場大火相比，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於1812年燒毀莫斯科不過是微不足道的小火災，歷史上只有尼祿焚城可以與之相較。」陶德曼身為虔誠基督徒，以「尼祿焚城」相較之，意味著將日軍行動比喻為瘋狂暴君的野蠻行為。海德薇寫道：「只要我活著，我將永遠不會忘記這副可怕的景象。」¹¹¹

從海德薇的描述可以清楚知道，閘北戰事緊鄰著公共租界。當時在上海的各國使節、商人和記者，無一不看到戰爭在眼前上演。透過媒體的傳播，消息很快就傳遍了世界，更將上海戰場的實況帶到了布魯塞爾會議的會場。¹¹²陶德曼夫婦所見的正是四行倉庫保衛戰，這顯示出，此戰除了戰術上的需要外，更是一場向國際社會的展演。如李君山教授所說，孤軍堅守的目的在於「為民心民氣而戰、為國際輿論而戰」。¹¹³

陶德曼認為，日本在戰場上沒有取得決定性勝利是提出調停的關鍵因素，這讓日本人反而比中國人更想要和平。因此他意識到日本並

¹¹⁰ 〈陶德曼夫人海德薇於1937年10月29日於南京薩家灣給女兒Maria的家書〉，PA AA NL Trautmann 1。

¹¹¹ 〈陶德曼夫人海德薇於1937年10月29日於南京薩家灣給女兒Maria的家書〉，PA AA NL Trautmann 1。

¹¹² 李君山，《為政略殉——論抗戰初期京滬地區作戰》（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2），頁131-132。

¹¹³ 李君山，《為政略殉》，頁133。

非放棄要求中國承認滿洲國，而是一種談判的技巧。他在日記中嚴厲批判激進化的日本軍方，寫道：「所有的不幸都來自於士兵的為所欲為。」¹¹⁴

四、第二次調停——勝者迷思

在陶德曼執行第一次調停的同時，不管在戰場上或是會場上的局勢都對中國越來越不利。隨之而來的南京戰役，是日本攻略與中國政略之間的對壘。雖然南京成了戰略上的棄子，但卻是蔣中正準備戰爭長期化和獲取國際同情的政略。相反的由於戰場上的勝利讓日本陷入「勝者迷思」之中，誤以為南京陷落能徹底瓦解國民政府。布魯塞爾會議的結果和廣田的承諾，直接促成了第二次陶德曼調停。

（一）南京攻略 VS 南京政略

上海淪陷後，陶德曼寫道：「雖然蔣中正將希望都放在布魯塞爾會議是錯誤的決策，但是在上海淪陷的情況下，他依然沒有失去抗戰到底的決心。」¹¹⁵面對局勢快速惡化，他在日記中氣憤地寫道：「蔣中正的罪責在於拒絕日本的和談條件。」¹¹⁶此後中日雙方都將目光移向南京，第二次陶德曼調停就是在日本政府與前線軍人對於是否攻略南京產生矛盾的情況下發生的。¹¹⁷

日軍參謀本部於 1937 年 11 月 7 日要求各部隊不得跨越蘇州—嘉

114 〈陶德曼日記——1937 年 11 月 9 日於南京〉，PA AA NL Trautmann 1。

115 〈陶德曼日記——1937 年 11 月 12 日晚上於南京〉，PA AA NL Trautmann 1。

116 〈陶德曼日記——1937 年 11 月 13 日於南京〉，PA AA NL Trautmann 1。

117 請參照：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戰史叢書(9)－大本營陸軍部〈1〉－昭和十五年五月まで》(東京：朝雲出版社，1967)，頁 502-503。

興的禁制線，其主因在於擔憂日蘇戰爭的爆發。為了避免兩面作戰，參謀本部希望以淞滬會戰的勝利迫使中國接受調停，然而少壯派軍官大多主張與中國決戰。在沒有取得參謀本部的同意下，第十軍司令官柳川平助(1879-1945)於 11 月 17 日制定了〈從嘉興向南京追擊的作戰指導要領〉，次日向各軍團下令進攻南京。¹¹⁸

同日法肯豪森在與張群會談後，認定國府不會堅守南京。他向陶德曼說道：「中國政府將會防守南京，但不是固守。這意味著不能在沒有戰鬥的情況下陷入日本人之手。」¹¹⁹他力勸陶德曼向中國施壓，讓中日進行和平談判。此時蔣中正清楚知道南京失守是遲早的問題，他於 11 月 18 日的日記中寫道：「敵必由吳興直攻首都……發表遷都日期。」¹²⁰他堅守南京是為了等待國際局勢的變化，如果撤守將會影響國內士氣和國際觀瞻。¹²¹他於 17 日的日記中明確地寫道：「使美德聯合調停。……使英美促進蘇聯參戰。」¹²²根據麻田雅文的研究，11 月 18 日史達林(Joseph Stalin, 1878-1953)已向軍事委員會參謀次長楊杰(1889-1949)明言無法出兵，然而楊轉達給蔣時卻翻譯為：「中國現在竭盡全力抗戰取得了很好的戰績。如果中國遭遇不利，蘇聯也可以對日宣戰。」這讓蔣誤以為蘇聯會對日宣戰。從日本不擴大派也擔憂蘇聯參戰可以得知，蔣的期待是有依據的。¹²³

當參謀本部於 11 月 20 日收到第十軍已於 19 日越過禁制線時，

¹¹⁸ 李君山，《為政略殉》，頁 191-192。

¹¹⁹ 〈陶德曼日記——1937 年 11 月 18 日於南京〉，PA AA NL Trautmann 1。

¹²⁰ 《蔣中正日記》，1937 年 11 月 18 日，典藏號：002-150101-00023-442。

¹²¹ 李君山，《為政略殉》，頁 203。

¹²² 《蔣中正日記》，1937 年 11 月 17 日，典藏號：002-150101-00023-441。

¹²³ 麻田雅文，〈1937 至 1941 年間蔣介石與史達林的書信往來〉，收入黃自進主編，《邁向和解之路——中日戰爭的再檢討(下冊)》(新北：稻香出版社，2019)，頁 87-89。

多田立刻要求停止向南京進發。¹²⁴但他的命令不僅沒有被遵守，甚至華中方面軍配合第十軍共同西進，直到五日後才向本部回報。20日在狄克森的主動詢問下，廣田表示，雖然日本在軍事上取得了成功，但在考慮到與德國情誼的情況下，日本的和談條件並沒有改變，也就是沒有要求「華北獨立」。¹²⁵這段話有三個重要意涵，關係到調停的成敗：第一、廣田是在清楚知道日軍在戰場上取得重大成果的情況下，依然沒有改變和平條件。第二、比起中國方面在意的滿洲國承認問題，廣田更關注的是華北獨立。第三、此次調停依然是在德國的主動建議下，廣田考量到與德國的關係而提出。

與此同時，義大利確實如廣田設想，承諾在加入反共協定後，隨即承認滿洲國，以換取日本對阿比西尼亞主權問題的讓步。¹²⁶魏茨澤克在一份機密報告中提到，在日本要求下義大利駐德大使阿托利科(Bernardo Attolico, 1880-1942)於1937年11月20日向德國政府表示，希望德國也承認滿洲國，或者至少在私下和事實上(*de facto*)承認，對此日本將給予在滿洲國的經濟特權作為回報。他補充說，里賓特洛甫已經秘密向他承諾，即使日本沒有給予回報，希特勒也會承認滿洲國。如上所述，至少在11月20日前德義兩國確實承諾日本，將會承認滿洲國。¹²⁷

參謀本部在無法阻止第十軍擅自行動的情況下，於1937年11月

¹²⁴ 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戰史叢書(9)－大本營陸軍部〈1〉－昭和十五年五月まで》，頁502-503。

¹²⁵ PA AA RZ 211/101399, S. 61: Telegramm von Dirksen in Tokio an AA am 20. November 1937; PA AA RZ 105/29976: Neurath in Berlin an Diplogerma in Hankow am 22. November 1937.

¹²⁶ PA AA RZ 105/29976: Hassel in Rom an AA am 20. November 1937.

¹²⁷ PA AA RZ 105/29976: Aufzeichnung von Weizsäcker in Berlin am 20. November 1937.

24 日追認第十軍的行動。¹²⁸比對時間可以發現，廣田告知狄克森和平條件沒有改變的時間早於參謀本部正式追認第十軍的行動。這意味著，當日軍不受政府控制向南京進發時，廣田依然遵守著近衛內閣原有與國府和談的政策。軍方對此並不知情，而是透過破解國民政府內部通信後才得知。¹²⁹廣田維持對國民政府和緩的和平條件，隨即遭到軍方強烈的反對。¹³⁰此時前線士兵不可能接受沒有要求中國政府「承認滿洲國」、「華北獨立」和「蔣中正下台」的和談條件。

就在日軍向南京進發之際，陶德曼於 11 月 22 日帶領部分使館成員搭船離開南京，前往漢口。當他得知布魯塞爾會議失敗的同時，也聽聞德國內部針對是否承認滿洲國的討論，而在給外交部的電報中表示：「無論是現在，還是戰爭結束後，我們都不應該退回到承認滿洲國和其加入反共協定的議題上，反則我們將會成為日本的宣傳工具。」¹³¹魏茨澤克在得知消息後樂觀地認為：「看來德國成功調停東亞衝突的機會來了。」¹³²他在給媒體局局長阿希曼(Gottfried Aschmann, 1884-1945)的信件中表示，布魯塞爾會議是中日和解的障礙，它讓中國誤以為會得到幫助。¹³³這意味著，蔣「國際化政略」的失敗也是促成第二次陶德曼調停的原因。

¹²⁸ 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戰史叢書(9)－大本營陸軍部〈1〉－昭和十五年五月まで》，頁 503-505。

¹²⁹ 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戰史叢書(86)－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頁 462。

¹³⁰ 原田熊雄，《「西園寺公と政局」第六卷》，頁 172；石射猪太郎，《石射猪太郎日記》（東京：中央公論社，1993），頁 226。

¹³¹ PA AA RZ 105/29976: Oskar Trautmann in Nanking an AA am 22. November 1937.

¹³² ADAP Serie D. Band I. Nr. 525 S. 640.

¹³³ PA AA RZ 211/101399, S. 61: Telegramm von Weizsäcker in Berlin an Herrn Gesandten Aschmann am 24. November 1937.

此時德國延遲承認滿洲國的原因可從以下兩封外交檔案中看出端倪。1937年12月2日日本駐德大使大島浩(1886-1975)拜訪凱特爾，凱特爾向他明確表示，德國延遲滿洲國承認的關鍵因素在於國防軍重整軍備需要中國贛南所蘊藏的鎢礦。¹³⁴魏茨澤克於12月7日給駐奉天領事的電報中提到：「元首希特勒不久前向日本大使解釋，他個人是承認滿洲國的，但是德國不承認滿洲國不是因為政治問題，而是中國對德國來說，是重要的商貿夥伴。如果承認滿洲國將導致德國在華利益受到嚴重的損害。」¹³⁵11月22日紐賴特向阿托利科說道：「我認為現在承認滿洲國不是必要的，因為我們在中日衝突中採取中立，因此不應該採取有利於日本的政策。這將使得中國不再信任我們，讓我們失去調停者的身分。……總理希特勒告訴我，他不會在反共協定周年紀念日承認滿洲國。」¹³⁶在外交官極力反對下，希特勒於23日正式向義大利表示，德國不會與義大利同時承認滿洲國。¹³⁷這不僅讓德日關係出現裂痕，更讓廣田維持原有和平條件的前提——也就是德國承認滿洲國——不復存在。¹³⁸

¹³⁴ PA AA RZ 105/29976: Mackensen an Herrn Direktor Pol. von Schmieden am 3. Dezember 1937.

¹³⁵ PA AA RZ 105/29976: Weizsäcker in Berlin an Consugerma Mukden am 7. Dezember 1937.

¹³⁶ PA AA RZ 105/29976: Aufzeichnung von Neurath in Berlin am 22. November 1937.

¹³⁷ ADAP Serie D. Band I. Nr. 526. S. 640.

¹³⁸ 比對時間後可以發現，廣田告知狄克森議和條件不變的時間早於參謀本部正式追認第十軍的行動。這意味著當日軍不受政府控制向南京進發時，廣田依然遵守近衛內閣原有與國府和談的政策，但他原本設想簽訂議和條件的前提，卻已在11月23日時化為泡影。請參照：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戰史叢書(9)－大本營陸軍部〈1〉－昭和十五年五月まで》，頁503-505。

(二) 象徵和平的納粹卐字旗

透過比對陶德曼日記和外交部與駐南京使館之間的電文後可以確認，由於駐地的轉移，使得陶德曼於 1937 年 11 月 27 日才得到紐賴特於 11 月 22 日傳來日本沒有改變和談條件的消息，¹³⁹並於 28 日晚宴時告知孔祥熙。¹⁴⁰次日他再告知王寵惠，¹⁴¹王立即將消息轉告蔣中正，並且寫道：「國聯與九國會議顯無切要辦法，而英、美、蘇又互相推諉。我方願以調停方法結束戰事，則對德方提議似不宜輕易放過，且應速有具體答覆。」¹⁴²

布魯塞爾會議失敗後，蔣將希望放在蘇聯參戰上，此時陶德曼又帶給他無須「承認滿洲國」的和平條件，讓他燃起了與日本和談的希望。¹⁴³11 月 30 日晚間 10 點孔祥熙突然請求陶德曼馬上出發前往南京與蔣會面。¹⁴⁴對此陶德曼感受到和平的曙光，他寫道：「現在車輪好像已經開始轉動。」¹⁴⁵然而此時陶德曼和魏茨澤克都沒有意識到，當他們成功阻止希特勒承認滿洲國時，就埋下了調停失敗的關鍵因子。

¹³⁹ PA AA RZ 105/29976, S. 299: Telegramm von Neurath in Berlin an deutsche Botschaft in Hankow am 22. November 1937.

¹⁴⁰ 〈陶德曼日記——1937 年 11 月 30 日於漢口〉，PA AA NL Trautmann 1。

¹⁴¹ 「陶德曼日程相關紀錄」，〈德國調停中日戰爭〉，《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990700-0009-007。

¹⁴² 「王寵惠給蔣介石急件」(1937 年 11 月 29 日)，〈德國調停中日戰爭〉，《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990700-0009-009、010 和 011。

¹⁴³ PA AA RZ 211/101399, S. 68: Oskar Trautmann in Hankow an AA am 30. November 1937.

¹⁴⁴ PA AA RZ 105/29976, S. 289: Telegramm Trautmanns in Hankow an AA am 30. November 1937.

¹⁴⁵ 〈陶德曼日記——1937 年 11 月 30 日於漢口〉，PA AA NL Trautmann 1。

在孔祥熙的請求下，陶德曼和他的秘書勞滕施拉格(Heinz Lautenschlager, 1894-1944)立即出發，於1937年11月30日深夜11點30分抵達港口與外交部次長徐謨(1893-1956)會合。11點45分他們搭乘海星號前往南京。為了避免日軍攻擊，該船懸掛著納粹的卐字旗。¹⁴⁶12月2日他於船上書寫的日記中稱讚蔣：「無論日本的和談條件是否被接受，蔣能夠做出這樣的決定絕非容易之事。」他引用希特勒的話：「外交官的任務不是英雄式的將一個民族帶往地獄，而是使之免於墜落地獄之中。」並補充道：「當外交官耽誤了他的職責，那就有罪於他的民族。」他很坦白地寫到，和談的最好時機是當他從上海回到南京的時候，那時中國軍隊還能夠堅守上海。船上的英國水手告訴陶德曼，他很榮幸能夠參與這歷史性的一刻。¹⁴⁷

1937年12月2日上午9時陶德曼抵達南京。¹⁴⁸在會見陶德曼之前，蔣中正召集軍事將領徵求對陶德曼調停的意見。出席的有顧祝同(1893-1987)、白崇禧(1893-1966)、唐生智(1889-1970)、徐永昌(1887-1959)和錢大鈞(1893-1982)。當中白崇禧認為日本沒有要求成立華北獨立政權、承認滿洲國和賠款，因此條件不算苛刻，但是他擔憂日後中國會遭到他國孤立。顧祝同贊同白的看法。徐永昌則認為先接受調停，再慢慢商議條件。唐生智表示贊同眾人的看法。¹⁴⁹自從第一次陶德曼調停以來，

146 〈陶德曼於南京給外交部電報——1937年12月2日〉，PA AA IH Rep. IV. Personalia Nr. 85 Trautmann Band 3。

147 〈陶德曼日記——1937年12月2日從漢口駛向南京的海星號甲板上〉，PA AA NL Trautmann I。

148 「陶德曼日程相關紀錄」(1937年11月28日到12月2日)，〈德國調停中日戰爭〉，《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990700-0009-007。

149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1937年十二月二日〉。「近代春秋 TIS(Timelines Information System)系統」，<https://mhdb.mh.sinica.edu.tw/diary/index.php>，擷取日期：2022年6月18日。

國府內部官僚主和聲浪也越來越大。¹⁵⁰德國轉告的和平條件中並沒有承認滿洲國，這讓蔣中正正在日軍兵臨城下之際，也不得不接受眾議，同意德國調停。¹⁵¹

1937年12月2日下午5時陶德曼在徐謨的陪同下拜訪蔣中正。¹⁵²他於隔日的日記中寫道：「昨天是我人生中最偉大的一日。」蔣在向他表示日本和平條件沒有改變後，接受了調停。同時蔣提出三個重要前提：「第一、德國必須作為調停者參與談判直到最後；第二、必須清楚地表示中國對華北的領土和行政權完整；第三、和約中不得損害第三國的權利。」¹⁵³他補充到，停止敵對關係的第一步是「日軍必須留在原地，同時中國軍隊撤回南京」。談話最後陶德曼向蔣表示，他本人不會忘記這歷史性的一刻，他的任務是幫助蔣達成和平。¹⁵⁴然而早於前一日日本大本營陸軍部的〈支那事變解決處理方針案〉就已經推翻了之前的和平條件。¹⁵⁵

會談之後陶德曼與他的部屬羅森(Georg Rosen, 1895-1961)談話時，羅森引用聖經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節：「使人和者福矣！因為他們必稱為

¹⁵⁰ 王奇生，〈抗戰初期的「和」聲〉，收入呂芳上主編，《戰爭的歷史與記憶》（臺北：國史館，2015），頁45-47。

¹⁵¹ 「會議記錄」（12月2日），〈德國調停中日戰爭〉，《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990700-0009-008。

¹⁵² 「陶德曼調停日程紀錄」（1937年11月28日到12月2日），〈德國調停中日戰爭〉，《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990700-0009-007。

¹⁵³ 〈陶德曼日記——1937年12月3日於南京〉，PA AA NL Trautmann 1。

¹⁵⁴ 〈陶德曼日記——1937年12月3日於南京〉，PA AA NL Trautmann 1。

¹⁵⁵ 提出的新停戰條件為：1. 中國承認滿洲國。2. 在華北建立親日政權。3. 中國停止排日反滿。4. 中國確定防共政策。5. 日本協助建立新上海。6. 中日滿三國建立資源開發、物資交易、航空等互惠協定。7. 中國賠償事變中日僑民的損失。請參照：島田俊彥、稻葉正夫、白井勝美編，《現代史資料(9)- 日中戰爭(2)》（東京：みすず書房，1964），頁51-52。

神的兒子。」他將句子改成「致和者福矣(Beati pacifici)」來讚賞此次的調停工作。往後當陶德曼回憶此事時均引用這句話，這說明了基督教信仰給予他在調停工作上道德的支持。直到去世前他都認為調停中日戰爭是他一生中最偉大的外交工作，也是身為基督徒最榮耀上帝的時刻。¹⁵⁶

(三) 破滅的城下之盟

當陶德曼還在返回漢口的船上時，狄克森透過歐特獲取日本軍方的意向，並於3日向外交部表示，由於日本已經征服了華北，使得政府必須考慮到主戰派的意見，要求蔣中正下台。日本對於調停越來越不感興趣，甚至是否將國民政府視為談判對手，其意見也相當分歧。¹⁵⁷

同日日本海軍截獲孔祥熙給駐美大使王正廷(1882-1961)關於陶德曼調停的電文，¹⁵⁸其中沒有承認滿洲國的條件很快在軍隊中傳開。¹⁵⁹這讓廣田成為了主戰派的眾矢之的，影佐禎昭(1893-1948)甚至宣稱要殺害廣田。在政府元老西園寺公望(1849-1940)向陸相杉山元(1880-1945)說明廣田的真意後，才彌平了主戰派的不滿。時任西園寺秘書的原田熊雄(1888-1946)在回憶錄《「西園寺公と政局」第六卷》中還原了廣田從第一次陶德曼調停時，就抱持著對和平條件可以因時制宜的態度。因此在華北局勢穩定、日軍兵臨南京城下，和德國沒有承認滿洲國的情況下，廣田已經準備提出嚴苛的和平條件。¹⁶⁰外務省東亞局長石射猪太郎(1887-

¹⁵⁶ ADAP Serie D. Band I. Nr. 528 S. 642.

¹⁵⁷ PA AA RZ 105/29976, S. 277-278: Telegramm von Dirksen in Tokio an AA am 3. Dezember 1937.

¹⁵⁸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日中戰爭。第一冊》，頁206。

¹⁵⁹ 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戰史叢書(86)－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頁462。

¹⁶⁰ 原田熊雄，《「西園寺公と政局」第六卷》（東京：岩波書店，1952），頁172。

1954)在其日記中也證實了這一點。¹⁶¹

此時外交部對調停成功還滿懷希望，¹⁶²不斷透過歐特，或通過大島，向參謀本部諮詢日軍的意圖。¹⁶³陶德曼於 1937 年 12 月 6 日才接獲狄克森的電文通知，日本軍方反對與中國和談，因為部分有影響力的軍人堅持蔣中正必須下台。陶德曼建議外交部，如果日本人在關鍵點上三心二意，那麼德國就不應該擔負調停工作。¹⁶⁴蔣在同日的日記中寫道：「倭寇對德國大使所提調停辦法，以我不能屈服，彼已決絕乎。」¹⁶⁵

雖然蔣中正於 1937 年 12 月 6 日電告李宗仁(1891-1969)、閻錫山(1883-1960)時誓言道：「南京決守城抗戰，圖挽戰局；一月以後，國際形勢必大變，中國當可轉危為安。」¹⁶⁶然而期待唐生智能夠堅守一個月的目的已經不是為了等待國際局勢的變化，而是怕棄守南京會影響國內士氣和國際觀瞻。由於戰況極為慘烈，蔣於 12 月 11 日夜電告唐生智：「如情勢不能久持時，可相機撤退。」¹⁶⁷他又於同日的日記中寫

¹⁶¹ 石射猪太郎，《石射猪太郎日記》，頁 226。石射在回憶錄中也寫道：「根據海軍收到的一份電報，中國已經開始考慮和平問題。……但現在已經太晚了。從現在開始的和平條件絕不會帶來日中之間的根本和解。」外務省內雖有如石射的主和派，但最終廣田還是推翻了原有的條件。相反的，此時參謀本部內的不擴大派依然試圖在內部連絡會議和閣議中力挽狂瀾。

¹⁶² PA AA RZ 211/101399, S. 84-94: Telegramm von Dirksen in Tokio an AA am 3. Dezember 1937.

¹⁶³ 原田熊雄，《「西園寺公と政局」第六卷》，頁 173。

¹⁶⁴ 〈陶德曼日記——1937 年 12 月 6 日於漢口〉，PA AA NL Trautmann 1。

¹⁶⁵ 《蔣中正日記》，1937 年 12 月 6 日，典藏號：002-150101-00023-468。

¹⁶⁶ 《史料初編》，第二編，「作戰經過」(二)，頁 219。轉引自：李君山，《為政略殉》，頁 256。

¹⁶⁷ 郭岱君主編，《重探抗戰史(一)》(臺北：聯經出版社，2015)，頁 369。

道：「對倭政策惟有抗戰到底，此外並無其他辦法。」¹⁶⁸從中可以得知，失去南京也意味著失去了與日本和談的可能性，更讓蔣決心抗戰到底。¹⁶⁹因此南京到了 12 月 6 日以後就像一座偌大的四行倉庫，成為向國際宣傳的展演場。

廣田於 1937 年 12 月 7 日向狄克森表示，他正在徵求陸海軍的意見，他懷疑軍隊在取得重要的勝利後，是否還會基於相同的基礎上進行談判。狄克森質問他，日本於 11 月中佔領上海後，廣田已經向他表示和談條件沒有改變。現在中方以和解的態度面對和談，德國希望日本也採取一樣的態度。如果國民政府倒台，將會導致中國赤化，這對日本未來非常不利。¹⁷⁰廣田回答，在過去幾週中，由於戰爭取得重大的進展導致局勢改變，前線軍隊提出了要求。現在日本國民對中國的態度也產生變化，他們要求從根本上調整日中關係。¹⁷¹因此，日本將會重新考慮和平條件。

與狄克森會面後，廣田立即會同首相、陸相和海相，達成維持透過德國調停的共識，但由於南京戰事在即，因此決議等待戰爭結束後再正式給予答覆。會後陸、海、外三省官員舉行了聯絡會議，討論新的和平條件。¹⁷²與此同時，陶德曼於 12 月 8 日的日記中寫到，德國

¹⁶⁸ 《蔣中正日記》，1937 年 12 月 05 日至 12 月 11 日本週反省錄，典藏號：002-150101-00023-474。

¹⁶⁹ 《蔣中正日記》，1937 年 12 月 12 日至 12 月 18 日本週反省錄，典藏號：002-150101-00023-483。

¹⁷⁰ PA AA RZ 105/29976, S. 239: Telegramm von Dirksen in Tokio an AA am 7. Dezember 1937; 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戰史叢書(86)－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頁 460。

¹⁷¹ 服部龍二，《廣田弘毅：「悲劇の宰相」の実像》，頁 175。

¹⁷² 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戰史叢書(86)－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頁 462。

調停行動是基於日本提出的條件，當日本改變了條件，那麼德國不應參與調停。¹⁷³

由於調停無望，德國政府只能確保自己在不打破中立原則和合乎國際外交禮節下，結束作為信使的工作。¹⁷⁴紐賴特於 1937 年 12 月 10 日指示狄克森，德國作為信使的底線，在於不會替日本轉交污辱或不合時宜的條件給中國。¹⁷⁵隔日陶德曼於日記中寫到，日本洩漏了 10 日內閣會議的消息，會中首相近衛甚至批評：「中國在修補和平方面的努力不夠真誠，未表現出與日本全心全意合作推進亞洲和平事業的願望。」¹⁷⁶對此陶德曼感到非常的憤怒，於 12 月 11 日的日記中寫道：「日本人的行為顯示出，日本不是一個值得與之達成任何條約的國家。」¹⁷⁷同日王寵惠拜訪陶德曼，他擔憂王會批評德國讓中國落入糟糕的局勢之中，然而王卻很友善地請求德國繼續為中國的和平努力。¹⁷⁸

¹⁷³ 〈陶德曼日記——1937 年 12 月 8 日於漢口〉，PA AA NL Trautmann 1。

¹⁷⁴ PA AA RZ 105/29976, S. 244-245: Telegramm von Neurath in Berlin an deutsche Botschaft in Tokio am 9. Dezember 1937.

¹⁷⁵ ADAP Serie D. Band I. Nr. 538 S. 651.

¹⁷⁶ 在日文史料中查無該會議，但根據廣田弘毅傳記刊行會編的《廣田弘毅》和《石射猪太郎日記》，在狄克森告知中國接受調停後，廣田隨即召開四相會議，隔日又與陸軍大臣商討此事。因此陶德曼應該是指此會議。會議決議：「1. 蔣介石必須為當今局勢負責。對日本來說，將很難與蔣展開談判；2. 中國當局的和平條件中缺乏誠意和信任；3. 如果中國不停止反日立場，那麼日本不會考慮中國的和平條件；4. 當蔣介石的政府變成了地方政權時，將有利於日本在華中和華北建立新的政府。」〈陶德曼日記——1937 年 12 月 11 日於漢口〉，PA AA NL Trautmann 1。廣田弘毅傳記刊行會編，《廣田弘毅》（東京：廣田弘毅傳記刊行會，1966），頁 303。石射猪太郎，《石射猪太郎日記》，頁 227-228。

¹⁷⁷ 〈陶德曼日記——1937 年 12 月 11 日於漢口〉，PA AA NL Trautmann 1。

¹⁷⁸ 〈陶德曼日記——1937 年 12 月 12 日於漢口〉，PA AA NL Trautmann 1。

五、第三次調停——騎虎難下的德國政府

南京淪陷後，日本前線士兵與公眾輿論沉溺於狂喜之中。這使得主戰派得以在政府高層會議中徹底壓制不擴大派的意見，最終提出了幾近逼降的苛刻條件。這讓主持調停工作並維護自身中立地位的德國陷入了騎虎難下的窘境。德國為急於擺脫尷尬的局面，因而有了消極替日本轉交和平條件的第三次陶德曼調停。

（一）戰、和之間

當陶德曼於 1937 年 12 月 13 日接獲蔣中正離開南京的消息時，他寫道：「這次的撤退並沒有對國民政府的抗日政策產生影響，只是南京城不再是軍事和政治中心。」¹⁷⁹他於 12 月 14 日的家書中非常扼腕地寫道：「我到南京出差時所懷抱讓東亞恢復和平的希望都付之東流。」他又描繪道：「日本人沉醉於佔領敵人首都的喜悅之中，就像是 1812 年時拿破崙佔領莫斯科一樣。」¹⁸⁰當他於 12 月 28 日聽到日本在南京的暴行時，在日記中悲痛地寫道：「日本人不只謀殺了平民，甚至強姦了女孩和婦女。」大屠殺的消息對於致力於調停工作的陶德曼來說，無疑是道德與信仰的沉重打擊。他寫到，這些消息讓和平談判變得更不可能。¹⁸¹

南京淪陷是日本內部面對中國問題的開始。華北方面軍在沒有與內閣商討的情況下，於 12 月 14 日在北京扶植了華北臨時政府。¹⁸²此

¹⁷⁹ 〈英文字條——1937 年 12 月 13 日〉，PA AA NL Trautmann 1。

¹⁸⁰ 〈陶德曼給他的孩子們的家書——1937 年 12 月 14 日〉，Privatarchiv Korinna Trautmann。

¹⁸¹ 〈陶德曼日記——1937 年 12 月 28 日於漢口〉，PA AA NL Trautmann 1。

¹⁸² 風見章，《近衛內閣》（東京：日本出版協同株式會社，1951），頁 88；防

時日本政府對和平談判的判斷與陶德曼完全相反，他們均認為佔領南京是迫使國民政府和談的最佳時機。第二次聯絡會議於 12 月 14 日召開，會中決定推翻 11 月 2 日的和平條件，由此可見中國必須承認滿洲國已成為日本各方的共識。¹⁸³

會議結果讓不擴大派非常失望，他們聯繫各省次長，強烈主張取消這次的決議。他們認為，第一、無視和平談判是對國家信仰的違背，日本會被認為是以此為藉口，行戰爭與侵略之實。這將有悖於道德原則。第二、若日本參與和平談判，中國就必須予以接受；相對地，若中國不接受，日本也應中止其單方面提出的談判。第三、如果我們無法接受過去提出的和平條件，那就必須明確指出我們想要的條件。日本政府應該致力於讓日中之間建立友好的兄弟關係，而非進行一場沒有具體回報的虛無戰爭。¹⁸⁴石射猪太郎認為 12 月 14 日的決議無疑是在逼降中國政府。儘管不擴大派努力地斡旋，¹⁸⁵廣田也提議放寬部分條件，仍遭到閣議反對。¹⁸⁶18 日臨時閣議通過了強硬的和平條件。

自南京淪陷後主戰派的勢力大增，從末次信正(1880-1944)擔任內相可以看出端倪。直到 12 月 18 日為止，主戰派和不擴大派的共識是，依然承認國民政府，並透過德國與之接觸，同時推翻 11 月 2 日的和平條件，要求中國必須承認滿洲國。

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戰史叢書(9)－大本營陸軍部〈1〉－昭和十五年五月まで》，頁 517

¹⁸³ 風見章，《近衛內閣》，頁 87-95。

¹⁸⁴ 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戰史叢書(9)－大本營陸軍部〈1〉－昭和十五年五月まで》，頁 521

¹⁸⁵ 風見章，《近衛內閣》，頁 98-100。

¹⁸⁶ 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戰史叢書(86)－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頁 463。

(二)調停或是逼降？

日本駐柏林參贊於 1937 年 12 月 14 日明確向魏茨澤克坦白，日本提出的新和平條件超過了 11 月 2 日的範圍。¹⁸⁷狄克森於 12 月 16 日寫道：「攻陷南京之後，參謀本部在前線士兵的壓力下徹底改變了條件。末次擔任內相後，內閣提出更嚴厲的條件。」¹⁸⁸

日本政府拖延到佔領南京後的 1937 年 12 月 17 日才正式回覆國民政府接受調停，對此陶德曼於日記中寫道：「我懷疑德國是否應該作為『信使』轉交日本的新條件給中國。」他批判道：「很顯然的日本人沒有從凡爾賽條約中學到教訓。」¹⁸⁹同時他擔心納粹政府會傾向勝利者，不再嚴守中立，因此於 12 月 20 日主動向外交部請求指示。次日下午他在外交部祕書段茂瀾(1899-1980)的陪同下與蔣中正會面。他對蔣說到，他不認為日本會理性答覆中國，「如果日本提出侮辱性的和談條件，德國將不會轉達。」¹⁹⁰

當日陶德曼在日記中分析了外交官和士兵思維方式的不同。他認為外交官的天職在於阻止會導致徹底毀滅的錯誤行動，讓交戰雙方從無法解決衝突的泥濘之中跳脫出來。反之，軍隊的目的在於竭盡所能摧毀敵人，如同魯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 1865-1937)的總體戰理論。日本突然改變和談條件的原因在於軍隊干涉外交，這將會讓一戰德國戰敗的

¹⁸⁷ PA AA RZ 211/101399, S. 165: Aufzeichnung von Weizsäcker in Berlin am 14. Dezember 1937.

¹⁸⁸ PA AA RZ 105/29976, S. 216: Telegramm von Dirksen in Tokio an AA am 16. Dezember 1937.

¹⁸⁹ 〈陶德曼日記——1937 年 12 月 17 日於漢口〉，PA AA NL Trautmann 1。

¹⁹⁰ PA AA RZ 211/101399, S. 173: Telegramm Trautmanns in Hankow an AA am 22. Dezember 1937.

悲劇在東亞重新上演。¹⁹¹

日本閣議於 1937 年 12 月 21 日通過了《對在京德國大使回答案》。¹⁹²外交部將之告知陶德曼。他於 12 月 26 日轉交給中國政府。¹⁹³由於蔣中正身體不適無法接見陶德曼，改由孔祥熙向陶德曼轉達，中國對該條件感到驚愕。¹⁹⁴事實上面對日本突然提出嚴苛的和平條件，德國政府也一樣感到訝異。此次工作連陶德曼本人都不認為是調停，而是日本片面的逼降。為此紐賴特指示他於 12 月 27 日向徐謨再次表達德國對調停工作的立場。¹⁹⁵

陶德曼於同日的日記中寫道：「當我讀到紐賴特電報中日本的要求後，我感到十分作嘔。」他認為日本的條件過於模糊，這給予日本許多彈性來解釋自己的要求。實際上這意味著全權委託日本，讓日本

¹⁹¹ 〈陶德曼日記——1937 年 12 月 21 日於漢口〉，PA AA NL Trautmann 1。

¹⁹² PA AA RZ 211/101399, S. 176-179: Telegramm von Dirksen in Tokio an AA am 23. Dezember 1937. 此案內容為：「1. 中國必須放棄親共、反日和反滿洲國的政策，並且聯合日本和滿洲國共同實行反共政策；2. 在必要的地區設置非武裝區，並且設立特殊機構管理之 3. 締結日、中、滿三國經濟合作的協議；4. 中國必須賠償日本的損失。」

¹⁹³ PA AA RZ 211/101399, S. 214: Telegramm Trautmanns in Hankow an AA am 26. Dezember 1937.

¹⁹⁴ PA AA RZ 105/29976, S. 184: Telegramm Trautmanns in Hankow an AA am 26. Dezember 1937.

¹⁹⁵ 「紀錄德使陶德曼與次長徐謨之談話內容」(1937 年 12 月 27 日)，〈德國調停中日戰爭〉，《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990700-0009-025 和 026。談話內容為：「1. 德國有義務持續信使的角色，將日本的回答按照原話地告知中國政府。這樣的告知無涉於德國支持或反對中國；2. 只要中國政府認為這樣的條件可以接受，那麼德國將持續擔任信使的角色，將中國政府的答覆告知日本。3. 德國駐東京大使被委託提醒日本政府，日本政府提出的年底期限應該考慮到轉告任務上的技術問題。」

可以對中國予取予求。¹⁹⁶

(三) 和平工作的終結——近衛聲明

孔祥熙於 1937 年 12 月 27 日傍晚告訴陶德曼，沒有人可以接受日本的要求。陶德曼無奈地向孔說到，日本極端主義者反而認為這些條件過於緩和。¹⁹⁷外交部於 12 月 28 日聯絡陶德曼，歐特表示，日本人承諾只要中國接受和談條件，就可以開始談判，並且中止敵對關係。陶德曼認為這個消息無濟於事，因此僅派遣秘書勞滕施拉格告知徐謨。¹⁹⁸馬肯森於 12 月 29 日給狄克森的電報中指出，調停如果失敗很可能讓中國更倒向蘇聯，使中國共產主義化，這將與反共協定的立意不符，為了德日共同利益，日本政府不應該提出只滿足自己慾望的和平條件。¹⁹⁹

從王寵惠〈擬與德大使談話要旨〉中可以看出，國府早已準備好如何回覆日本，但卻未告知陶德曼。²⁰⁰1938 年 1 月 1 日孔祥熙感謝希特勒對於調停中日衝突的努力，他提出與陶德曼在日記中表達的相同

¹⁹⁶ 特別是「特殊機構」和「非武裝區」的條款，讓日本可以瓜分整個中國。

陶德曼認為，雖然廣田宣稱在蒙古設置「特殊政權」和華北獨立於南京的「自治政府」從屬於中國主權，但是卻從未正式告知過中國政府。請參照：〈陶德曼日記——1937 年 12 月 27 日於漢口〉，PA AA NL Trautmann 1。

¹⁹⁷ 〈陶德曼日記——1937 年 12 月 27 日於漢口〉，PA AA NL Trautmann 1。

¹⁹⁸ 「紀錄德參事勞滕施拉格與次長徐謨之談話內容」(1937 年 12 月 26 日)，〈德國調停中日戰爭〉，《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990700-0009-032 和 033。

¹⁹⁹ PA AA RZ 211/101399, S. 221-222: Telegramm von Mackensen in Berlin an deutsche Botschaft in Tokio 29. Dezember 1937.

²⁰⁰ 「王寵惠擬與德大使談話要旨」(1937 年 12 月底)，〈德國調停中日戰爭〉，《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990700-0009-036 到 039。

疑慮，認為日本的條件如同一張空白支票，過於模糊。²⁰¹陶德曼於 1 月 2 日的日記中寫到，外交部和狄克森仍寄望調停可以成功。他不相信日本是真心想要和談，而是在利用德國。他說道：「紐賴特的錯誤在於，他沒有勸告日本應該採取緩和的方式。」他甚至批評德國政府：「由於反共的立場，使得政府沒有看清楚日本真正要的是什麼。」在陶德曼看來，日本人要的不是廢止中蘇互不侵犯條約，也不是中國加入反共協定，而是壓制中國。²⁰²

陶德曼於 1 月 4 日與閻錫山討論和平的可能性。他對閻說：「由於日本的條件還很不明確，在漫長的等待過程中可以準備好防禦工事，而新年帶來的短暫休息，對『我們』來說有很多好處。」²⁰³使用「我們」一詞顯示，陶德曼將自己視為與中國一起對抗日本侵略的一份子。這顯然超出了他作為德國大使的立場。

陶德曼於 1938 年 1 月 7 日通知王寵惠，日本要求盡快得到中國政府的回覆，最晚不超過 10 日。²⁰⁴日本駐德大使東鄉茂德(1882-1950)於 1 月 10 日拜訪紐賴特時表示，只要戰爭拖得越久，日本的條件就會越嚴苛，日本已不再將蔣中正視為中國政府的代表。²⁰⁵狄克森於 1 月 11 日告知陶德曼，廣田表示軍方堅持中國人必須馬上給予答覆。如果中國人沒有給予肯定的答案，那麼內閣中主戰派將會越來越強勢，反之主

²⁰¹ PA AA RZ 105/29976, S. 154: Telegramm Trautmanns in Hankow an AA am 1. Januar 1938.

²⁰² 〈陶德曼日記——1938 年 1 月 2 日於漢口〉，PA AA NL Trautmann 1。

²⁰³ PA AA RZ 105/29976, S. 140: Telegramm Trautmanns in Hankow an AA am 4. Januar 1938.

²⁰⁴ 「王寵惠與陶德曼談話記錄」(1938 年 1 月 7 日)，〈德國調停中日戰爭〉，《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990700-0009-052 到 054。

²⁰⁵ PA AA RZ 105/29976 S. 124-125 Aufzeichnung von Neurath in Berlin am 10. Januar 1938.

和派只能夠退讓。陶德曼認為狄克森電報中的內容前後矛盾，因此沒有轉告給中國政府，他認為這樣無理的內容會讓德國政府的顏面盡失。²⁰⁶

陶德曼於 1938 年 1 月 12 日直接將前一日狄克森的電報出示給王寵惠，並批評自己本國的外交部長：「當日本人改變和談條件時，紐賴特就應該馬上拒絕繼續調停。」²⁰⁷王寵惠於 1 月 13 日下午口頭告知中國政府的決議後，陶德曼馬上將之轉告給外交部，並表示：「經過適當考慮，我們發現更改後的和談條件範圍過於廣泛。因此中國政府希望了解新提交條件的性質和內容，以便仔細審查後作出最終的決定。」²⁰⁸孔祥熙於 1 月 15 日下午感謝陶德曼和德國政府為調停工作做出的努力。他說到，中國為了與日本能夠達成真正可以持續下去的和平受到了許多的苦難，這關乎到中國的主權問題。²⁰⁹這意味著陶德曼調停正式失敗。

廣田於 1938 年 1 月 16 日告知狄克森：「帝國政府對此感到非常遺憾，因此放棄透過德國政府善意的調停行動，進行中日和平談判，決定以全新的角度處理當前的衝突。」²¹⁰同日近衛首相發表聲明：「帝國政府爾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期望真能與帝國合作之中國新政權之建立與發展，並將與此新政權調整兩國邦交。」²¹¹陶德曼於日記中批評「近衛聲明」中的說詞充滿謊言。他寫道：「中日雙方的激進派都對於調停失敗感到開心。」²¹²

206 〈陶德曼日記——1938 年 1 月 12 日於漢口〉，PA AA NL Trautmann 1。

207 〈陶德曼日記——1938 年 1 月 12 日於漢口〉，PA AA NL Trautmann 1。

208 PA AA RZ 105/29976 S. 103-104 Telegramm Trautmanns an AA am 13. Januar 1938.

209 「陶德曼與孔祥熙談話紀錄」(1938 年 1 月 15 日)，〈德國調停中日戰爭〉，《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990700-0009-075。

210 PA AA RZ 105/29976, S. 97-98: Telegramm von Dirksen an AA am 16. Januar 1938.

211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冊》，(東京：原書房，1965)，頁 386。

212 〈陶德曼日記——1938 年 1 月 19 日於漢口〉，PA AA NL Trautmann 1。

六、結論

從本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過去被認為是日方主動，或是納粹當局為了符合自身意識形態而發動的陶德曼調停，實際上卻是涉入多方利益角力，並隨著戰局動態調整的事件。這不僅是希特勒延續反共協定的對蘇地緣戰略考量，也是德國政府內部各派系的共識。對陶德曼個人而言是受到由個人經驗、基督信仰與對中國情誼產生的道德使命感所驅使。儘管納粹高層傾向支持日本，但基於重整國防軍軍備的考量，不得不對中日衝突採取保守中立的態度。

正式的調停工作起因於國聯決議召集布魯塞爾會議和淞滬會戰的膠著，結束於「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近衛聲明。從史料中可以應證，陶德曼調停是日本面對國際壓力和戰場膠著下的產物。前兩次調停都是在德國建議下，由日本主動提出和平條件而發動，並非國府求和，更非德日合作誘降。第三次調停已淪為日本片面的逼降行動。在調停期間，德國政府始終嚴守作為信使的中立角色，比起衝突當事國的舉棋不定，更期盼遠東恢復和平。

第一次調停失敗的主因在於蔣中正對於「國際化政略」的堅持，因而拒絕廣田提出較為和緩的和平條件——即沒有要求中方「承認滿洲國」。第二次調停失敗則是同時滿足三個條件而構成的，第一、在外交部親中派的反對下，希特勒於 1937 年 11 月 27 日確定不隨義大利承認滿洲國主權，這使得廣田以國際承認滿洲國向中國施壓的預期落空。第二、陶德曼因駐地轉移錯過了遞交和平條件給蔣中立的最佳時機，也就是從 11 月 23 日到德國確定不承認滿洲國的 11 月 27 日之間。第三、廣田對調停的看法始終抱持著因時制宜的態度。當德國確定不承認滿洲國時，日軍又於戰場上取得重大成果，這使得他直接承

受主戰派的壓力，必然改變之前的和平條件。第三次調停時日本提出蔣不可能接受的條件——「承認滿洲國」，因此這已非實質意義上的調停，而是注定失敗的逼降。

交通往返時間確實讓中日錯失了議和的時機，但絕非蔣中正於 1939 年 1 月 26 日所宣稱的緩兵之計。²¹³實際上日軍並沒有因為陶德曼調停而放慢向南京推進的速度。從日文史料中可以看出，日本軍方直到 1937 年 12 月 3 日才得知第二次陶德曼調停。對此主戰派極為反感，更不可能因此改變或停止攻略南京。蔣所謂的緩兵之計，應為第三次陶德曼調停時，國府刻意延遲回覆日本的逼降條件。

不可否認的是，陶德曼調停確實是蔣中正「國際化政略」的重要環節。從調停過程中，他始終抱持著對領土主權寸步不讓的態度。又透過國際會議和媒體報導，向世界傳達中國抗戰的決心，讓日本飽受國際輿論的批判。同時他又讓德國對遠東和平懷抱希望，使之持續履行合步樓條約，以確保國軍軍火運補的來源。從陶德曼調停可以清楚看出蔣對日本談判的底線——不承認滿洲國，反而是日本因戰場得勝落入「勝者迷思」之中，喪失了以戰逼和的預設目標，最終陷於中國戰場的泥濘之中。

「中國是否承認滿洲國」始終是陶德曼調停最關鍵的核心問題。從過程中可以發現，並非日本放棄要求中國承認滿洲國，而是保留了更大的模糊空間，讓中日雙方在說服內部時能各取所需。然而到了第三次調停時，日方徹底抹殺了中方對和平條件的解釋空間，反而保留了能讓自己任意詮釋的可能性。戰後陶德曼在未出版文章〈遠東局勢〉的草稿中寫道：「日本敗亡的開端是 1937 年末拒絕我的調停。當時蔣中正已經接受了日本提出的和平條件，可是日本違背了自己的諾

²¹³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主編，《民國二十八年之蔣介石先生》（臺北：政大人文中心，2016），頁 57。

言，重新提出了中國政府根本不可能接受的和平條件。」²¹⁴

調停期間德國外交部作為外交政策的執行機關，充分發揮了緩衝各方關係的功能。首先它緩衝了內部各派系對遠東政策的不同考量，使之對於若干德日遠東利益衝突的問題均維持著既定的政策，如：軍火輸中、駐華軍事顧問團和承認滿洲國。對外關係上，既讓日本暫緩要求德國表態上述之問題，又能維持與中國的友好關係。陶德曼本人在調停期間也充分發揮了「外交官作為緩衝者」的角色，一方面他力圖防止希特勒因中蘇交好而將遠東政策徹底倒向日本，另一方面他又試圖透過調停來挽救自反共協定以來國民政府對德國的不信任。他緩衝中德關係的努力，避免了中德兩國在危機事態下，關係隨即生變。

然而因陶德曼個人對日本的反感，讓他未從日方的角度衡量東亞局勢，而忽視了外務省面臨的內部壓力。因此在第二次調停時，他僅憑個人的道德使命感和對中國的同情，便對調停抱有不切實際的盼望，而沒有考量到失去日本內部支持的和平條件，必然會使調停破局。相反的陶德曼卻經常從中方立場來衡量局勢，特別是面對日本逼降的第三次調停。他經常站在中方立場反過來批評本國政府，更屢次逾越本國政府的訓令，儼然成為中國利益的守護人。他對中國的共情與文化的欽羨，雖然一方面緩和了中德兩國的直接衝突，但另一方面卻也讓他逐漸失去與本國政府立場的一致性。由於陶德曼明確的親中態度，使德國在調停期間，實際上展現更多的是親中的一面，而非親日。

從陶德曼個人言論和行為中可以發現，雖然他支持納粹「反共抗蘇」的戰略方針，但卻反對以法西斯主義意識型態主導遠東政策。從他對蔣中正領導中國抗戰的肯定，和多次批評納粹政府的遠東政策可以看出，他對德國出現了「國族疏離感」，反而展現出對國民政府的

214 〈未出版文章草稿——遠東局勢〉，PA AA NL Trautmann 7T。

共情。這並非只是為了符合德國國家利益的「目的合理性」行為，而是具有「互為主體性」的個人情感。²¹⁵他不再將中國視為「他者」，而是視為與自我地位相等的「主體」。在他描述的「東方」中，也並非如薩依德(Edward Said, 1935-2003)強調的「東方化東方」(Orientalizing the Oriental)，²¹⁶而是基於個人在東方親身經歷後的「個人化東方」。「東方」對他來說並非只是西方知識體系認知的樣貌，而更像是一面重新檢視歐洲文明的鏡子，映射出「成為中國」的陶德曼。

陶德曼作為保守的職業外交官僚，不僅對於德國，甚至對於中日兩國的意識型態激進化充滿擔憂。與納粹不同的是，面對共產黨的崛起，他依然相信西方式的議會主義，而反對任何具有暴力顛覆性的極端主義。他擔心中日戰爭持續太久，將會導致雙方激進的國家主義者掌控政權，最終導致毀滅。這樣的看法映射出他對於納粹掌權和歐洲局勢發展的無奈。他致力於調停不只是為了解決中日衝突，同時也是緩解歐洲緊張局勢的一種方法。他一再向納粹政府強調，日本激進派軍人以反共為藉口發動侵華戰爭，反而促使了中國的赤化。從長遠來看，都將不利於德日兩國的對華關係。陶德曼調停的失敗是中日戰爭長期化的序曲，最終也應證了陶德曼的擔憂——中國共產黨的崛起。因此從他個人的視角來看，日本侵華是中國共產革命的推手。

陶德曼調停的失敗更讓德國內部遠東政策的共識難以維持，但其徹底改變的關鍵因素仍在於對歐洲局勢的考量。1938年2月希特勒為

²¹⁵ 德國哲學家胡塞爾(Edmund Husserl)在分析「對他人關係構成」時提出的概念。「互為主體性」的三個特徵：第一、主體間的關係是相互對等的。第二、主體間是基於相互尊重和肯認的合作態度。第三、主體們對彼此提出的「有效性宣稱」均負有責任。請參照：Michael Theunissen, *Der Andere: Studien zur Sozialontologie der Gegenwart* (Berlin: de Gruyter, 1965), 79-83.

²¹⁶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London: Penguin, 1977), 49.

了德奧合併(Anschluss Österreichs)的外交佈局，以布隆貝格－弗里奇事件(Blomberg-Fritsch Krise)為由，改任命心腹里賓特洛甫主掌外交部，徹底架空職業外交官對外交政策的參與權，開始了真正意義上「親日」的遠東政策。在此之前納粹德國不僅是中方軍火的提供國，也是比中日兩國更希望遠東和平的致和者(Friedensbringer)。受制於意識型態的偏見和日後的敵我關係，納粹卐字旗曾經象徵著和平，飄揚在長江上的歷史，在政治正確下，被遺忘在歷史記憶之中。

(本文於 2024 年 10 月 4 日收稿；2025 年 3 月 27 日通過刊登)

*本文獲得林志宏老師悉心指導，對於論文主旨與論證架構之釐清與深化，貢獻尤鉅。杜子信、任天豪、蘇聖雄及黃自進諸師亦惠予寶貴意見，啟發良多。此外，本文復承匿名審查人詳讀指正，所提出之建議與批評，協助作者釐清若干疏漏與謬誤，實至感銘。於修改與定稿期間，又承林亨芬與袁經緯兩位協助，謹此一併致謝。

徵引書目

一、史料文獻

(一) 未刊檔案

科琳娜·陶德曼私人藏，《奧斯卡·陶德曼遺留文書》

Privatarchiv Korinna Trautmann

國史館藏，〈德國調停中日戰爭〉，《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990700-0009-004、020-990700-0009-005、020-990700-0009-006、020-990700-0009-007、020-990700-0009-008、020-990700-0009-009、020-990700-0009-010、020-990700-0009-011、020-990700-0009-025、020-990700-0009-026、020-990700-0009-032、020-990700-0009-033、020-990700-0009-036、020-990700-0009-037、020-990700-0009-038、020-990700-0009-039、020-990700-0009-051、020-990700-0009-052、020-990700-0009-053、020-990700-0009-054、020-990700-0009-075。

德國外交部政治檔案館藏，《奧斯卡·陶德曼遺留文書》

PA AA NL Trautmann 1：1937 年 10 月 19 日到 1938 年 1 月 22 日日記；其他相關檔案和書信。

PA AA NL Trautmann 6T：1937 日記；1937 年到 1938 年書信；1936 年到 1939 年案卷；其他相關檔案和書信。

PA AA NL Trautmann 7T：回憶錄；期刊論文；演講稿。

德國外交部政治檔案館藏，《奧斯卡·陶德曼人事檔案》

PA AA IH Rep. IV. Personalia Nr. 85 Trautmann Band 3

德國外交部政治檔案館藏，《國務秘書辦公室檔案》

PA AA RZ 102/29560：中日戰爭第一冊 1937 年 7 月 21 日到 10 月 27 日

PA AA RZ 102/29826：使節拜訪紀錄第一冊 1936 年 8 月到 1937 年 12 月

德國外交部政治檔案館藏，《副國務秘書辦公室檔案》

PA AA RZ 105/29875：中國/日本第一冊 1937 年 7 月到 1937 年 9 月

PA AA RZ 105/29876：中國/日本第二冊 1937 年 10 月到 1937 年 11 月

PA AA RZ 105/29976：九國會議 1937 年 10 月到 1938 年 1 月
德國外交部政治檔案館藏，《政治局東亞分處檔案》

PA AA RZ 211/101399：1937 年中日衝突－致和者
德國聯邦檔案館藏，《奧斯卡·陶德曼遺留文書》

BArch N 2311/1-43

(二) 史料彙編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日中戰爭。第一冊》，東京：外務省，2011。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冊》，東京：原書房，1965。

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86)－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東京：朝雲出版社，1975。

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9)－大本營陸軍部〈1〉－昭和十五年五月まで》，東京：朝雲出版社，1967。

島田俊彦、稻葉正夫、白井勝美編，《現代史資料(9)-日中戰爭(2)》，東京：みすず書房，1964。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主編，《民國二十八年之蔣介石先生》，臺北：政大人文中心，2016。

ADAP = Akten zur deutschen auswärtigen Politik, 1918–1945.

Serie C: 1933–1937. Göttingen, 1971–1981.

Serie D: 1937–1941. Baden-Baden, 1950.

(三) 日記、回憶錄、年譜

広田弘毅伝記刊行會編，《広田弘毅》，東京：広田弘毅伝記刊行會，1966。

石射猪太郎，《石射猪太郎日記》，東京：中央公論社，1993。

風見章，《近衛内閣》，東京：日本出版協同株式會社，1951。

原田熊雄，《「西園寺公と政局」第六卷》，東京：岩波書店，1952。

國史館藏，《蔣中正日記》，1937-1938。典藏號：002-150101-00023-287、002-150101-00023-441、002-150101-00023-442、002-150101-00023-468、002-150101-00023-474、002-150101-00023-483。

二、近人論著

(一) 專書

- 戶部良一，《ピース・フィーラー支那事変和平工作の群像》，東京：論創社，1991。
- 王揚，《1894-1938 年德國對華政策研究》，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
- 矢部貞治編著，御廚貴監修，《近衛文麿》，東京：ゆまに書房，2006。
- 朱子家，《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臺北縣：古楓出版社，1974。
- 李君山，《為政略殉——論抗戰初期京滬地區作戰》，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2。
- 周惠民，《德國對華政策》，臺北：三民書局，1995。
- 服部龍二，《廣田弘毅：「悲劇の宰相」の実像》，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8。
- 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史》，臺北：三民書局，1998。
- 郭岱君主編，《重探抗戰史(一)》，臺北：聯經出版社，2015。
- 陳仁霞，《中德日三國關係 1936-1938》，北京：三聯書店，2003。
- 劉傑，《日中戰爭下外交》，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
- Chang, Che-Wei (張哲維). "Oskar Trautmann, ein deutscher Diplomat in Ostasien: Individuum, Nation und Diplomatie aus der Perspektive der Globalgeschichte 1877-1950." Ph.D. Dissertation,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Bonn, 2021.
- Drechsler, Karl. *Deutschland-China-Japan 1933-1939. Das Dilemma der deutschen Fernostpolitik*. Berlin: De Gruyter, 1964.
- Fox, John. *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1-193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Kirby, William.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Müller, Rolf-Dieter. *Der Feind steht im Osten: Hitlers geheime Pläne für einen Krieg gegen die Sowjetunion im Jahr 1939*. Berlin: Ch. Links Verlag, 2011.
- Nieh, Yu-Hsi. *Die Entwicklung des chinesisch-japanischen Konfliktes in Nordchina und die deutschen Vermittlungsbemühungen*. Hamburg: Institut für Asienkunde, 1970.
- Said, Edward. *Orientalism*. London: Penguin, 1977.

Theunissen, Michael. *Der Andere: Studien zur Sozialontologie der Gegenwart*. Berlin: de Gruyter, 1965.

(二) 期刊論文

- 王建朗，〈陶德曼調停中一些問題的再探討〉，《中共黨史研究》，1989：4(北京，1989)，頁 289-296。
- 杜子信，〈近代德波敵對下德意志騎士團國家史的政治工具化〉，《成大歷史學報》，56(臺南，2019)，頁 133-199。
- 施子愉，〈抗戰初期德日誘降的陰謀〉，《近代史資料》，1957：3(北京，1957)，頁 66-110。
- 陳哲宇，〈抗戰前中德鎢礦貿易及其影響之探討(1929-1937)〉，《中興史學》，12(臺中，2006)，頁 109-132。
- 鹿錫俊，〈中日戰爭時期日本對蔣政策的演變〉，《近代史研究》，1991：4(北京，1991)，頁 210-237。
- 鹿錫俊，〈日本的國際戰略與中日戰爭的擴大化——論聯接中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一個關鍵因素〉，《近代史研究》，2007：6(北京，2007)，頁 41-61。
- 蔣永敬，〈抗戰初期的外交與國聯及德使之調停〉，《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5(臺北，1973)，頁 163-176。

(三) 論文集論文

- 王奇生，〈抗戰初期的「和」聲〉，收入呂芳上主編，《戰爭的歷史與記憶》，臺北：國史館，2015，頁 26-71。
- 張水木，〈德國對中國抗日戰爭之調停〉，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抗戰建國史研討會論文集(1937-1945)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頁 257-293。
- 麻田雅文，〈1937 至 1941 年間蔣介石與史達林的書信往來〉，收入黃自進主編，《邁向和解之路——中日戰爭的再檢討(下冊)》，新北：稻香出版社，2019，頁 81-124。

(四) 網路資料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春秋 TIS(Timelines Information System)系統」，
<https://mhdb.mh.sinica.edu.tw/diary/index.php>。

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s. “invenio - recherchieren, bestellen und zitieren.”
<https://archiv.diplo.de/arc-de/im-archiv-forschen/bestellen-und-zitieren-mit-invenio>. Accessed March 31, 2025.

Oskar Trautmann's Perspective on the Trautmann Mediation

Che-wei Cha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he “Trautmann Mediation” refers to Germany’s diplomatic effort at the outset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during which it acted as a neutral intermediary to convey Japan’s peace terms to China. The underlying motivations behind this initiative can be traced to the subjective interests of Adolf Hitler, internal political dynamics within Germany, and the moral convictions of the mediator, Oskar Trautmann. Trautmann personally conveyed the terms of the Japanese peace talks to Chiang Kai-Shek on three occasions: November 5, December 2 and December 26, 1937 (submitted to the Finance Minister Kung Hsiang-hsi due to Chiang’s illness). The first mediation occurred during the context of the Battle of Shanghai and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Nine Power Treaty Conference. It compelled Japan to offer relatively moderate terms—notably, without demanding China to recognize Manchukuo—yet failed due to Chiang’s adherence to an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aimed at mobilizing global opinion. The second mediation took place after the fall of Shanghai. Japan was divided over whether to attack Nanking, and Foreign Minister Hirota Koki communicated to Germany that the terms of the peace talks would remain unchanged. Hopes for peace were eventually dashed due to the rise of Japan’s pro-war faction, Germany’s temporary delay in recognizing Manchukuo, and a missed opportunity caused by the relocation of the

German Embassy. By the third mediation, Japan had shifted to demanding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reducing the effort to a unilateral campaign and placing Germany in a diplomatically awkward position. From Trautmann's perspective, the mediation had originated with Japan, prompted by a Germany suggestion, and failed primarily because Japan was caught up in an "illusion" prompted by military victory. Throughout the process, the German government maintained a posture of official neutrality, though Trautmann personally exhibited clear sympathies towards China and a critical stance towards Japanese aggression.

Keywords: Trautmann Mediation, Germany's China policy,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Chiang Kai-shek's terms for peace, The Manchukuo Question